

全球智库半月谈

华尔街为中美间交易放缓做好准备

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机遇

脱欧对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新秩序下的欧洲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

本期编译

安婧宜

侯书漪

刘立群

李笑然

宋泓

史明睿

沈仲凯

许平祥

杨 茜

伊林甸甸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华尔街为中美间交易放缓做好准备 7

导读：近几年来，中美间的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双双提高。但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在华盛顿不绝于耳。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会对中美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影响？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对此是如何判断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知名财经作家 Ronald Orol 做出了分析。

经济增长，路在何方？ 10

导读：众所周知，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陷入了普遍的增长停滞，但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却并未停止。那么，技术进步是否能继续推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欧洲国家又应该如何扭转其经济增长的颓势呢？

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机遇 14

导读：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会。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制模式，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体系随时间的变迁。本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变迁主要由中低收入国家推动，而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另外，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低收入国家依然集中在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领域。

美国经济的全球角色：联系、政策与溢出 19

导读：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检验美国经济增长，货币与财政政策，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以及经济政策对全球溢出的影响程度。本文从美国与世界经济在贸易、金融和商品市场上的经济联系，美国与全球商业和金融循环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溢出影响程度，全球经济对美国的潜在溢出渠道这四个方面入手，分析美国经济的全球角色。

脱欧对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26

导读：本文认为，英国脱欧将给伦敦金融城带来负面影响，从银行业、保险和再保险业、资产管理、和清算业务等方面评估了伦敦金融城将会遭受的损失，长期来看，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作者对英国政府究竟能否履行之前提出的各项承诺持怀疑态度。

经济政策

新秩序下的欧洲 32

导读：特朗普政府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贸易后，欧盟面对自身霸权地位下降的角色转变，为维护多边体系应采取哪些政策。本文首先探索美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第一”方向的原因。然后讨论美国新兴政策的核心要素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最后讨论欧洲在维持多边体系和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应该如何应对。

特朗普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法是错误的 36

导读：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改变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式。其目标是结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低估，从而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贸易协定，也就是减少赤字。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方法是错误的，存在很多缺陷。

什么是 NAFTA？，离开 NAFTA 之后，美国贸易会怎样？ 45

导读：NAFTA 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约定消除三国之间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认为 NAFTA 使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减少，以美国退出做筹码威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按照他的喜好达成新的协议内容。但有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 NAFTA 对美国工人工作机会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若美国退出 NAFTA，将会带来难以预测的经济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49

导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执政理念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从其执政理念出发，分析了特朗普的贸易及相关政策取向、实现的可能性及影响。

聚焦中国

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 66

导读：货币主义理论往往被误认为不重要。在不可能三角的限制下，大多数央行都放弃了货币目标，转而将政策目标着眼于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是，中国早在 1998 年就采用了“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政策。本文用两个公式描述了中国央行使用工具达成政策目标的方式，阐释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防止了严重通胀或衰退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央行缺乏独立性的事实。

战略观察

特朗普和朝鲜：是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还是继续保持冲突状态？ 71

导读：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上任，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有关朝核发展的新年致辞。人们对美国接下来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问题，美国与朝鲜关系如何发展都在积极关注中。2017年1月5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特朗普和朝鲜：是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还是继续保持冲突状态？》，作者主要介绍了朝鲜2016年核试验的一些情况，金正恩在充满争议的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希望，以及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朝鲜无核化等内容。

亚洲之行：马蒂斯的使命 73

导读：本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文章认为，马蒂斯此行主要有三个使命：第一是加强与日韩两国领导和防长的个人交流，第二是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第三是强调东北亚各项问题上美日韩开展双边和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而其向盟友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

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 . 75

导读：随着1月20日的到来，特朗普将真正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执政者。日本安倍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争取特朗普执政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谈。2017年1月17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网站发表文章《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作者主要从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东海、南海领域合作的利益，美国对韩日两国发展核武器以及日本对核武器发展的观点，TPP被废止后日本的新选择以及未来日本在美国和亚洲地区合作中的角色等三方面进行了叙述。

本期智库介绍 77

华尔街为中美间交易放缓做好准备

Ronald Orol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几年来，中美间的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双双提高。但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在华盛顿不绝于耳。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会对中美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影响？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对此是如何判断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知名财经作家 Ronald Orol 做出了分析，全文如下：

在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特朗普一改先前的表态，声明自己不会打破中美间维系了数十年的外交原则。在上任一月有余后，特朗普声称自己将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并切断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众所周知的是，在早先与蔡英文的通话中，特朗普曾经对“一个中国”原则发起过挑战。

然而，尽管特朗普反转了此前对中国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事实上，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普遍判断中美关系将出现重大变化，而这也将会严重波及中美的双边贸易和跨境交易。

最近特朗普内阁的商务部长 Wilbur Ross 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oss 表示，最近中国资本大举收购美国的娱乐和传媒业是一种“非互惠的举动”，因为美国资本完全不被允许在中国收购类似的企业。除了 Ross 之外，包括 Ted Cruz, Ron Paul 等在内的共和党议员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外界普遍认为，Ross 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重要成员，而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的是审议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通常来说，商务部长应该是积极拥护资本跨境流动、欢迎外国投资的，但这次情况将有所不同。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预计，除了 Ross 之外，另一位对国际贸易不太友好的官员——Peter Navarro 也将担任特朗普政府的全国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此人曾出版《中国绞杀美国》（Death by China）一书，且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要知道，与国家安全相比，经济安全可是个宽泛得多的议题。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担任这些要职，那毫无疑问的是，许多涉华贸易都将被搁置，而更多的对美投资将被腰斩。

时下，许多对冲基金经理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国资本收购芝加哥证交所一事。无疑，监管当局对这一收购案的态度昭示着美国对跨境贸易和并购的态度。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意图把这桩并购案推诿到

特朗普任期内，这也就使得保护主义者们有机会重新借机发难。他们认为，这桩并购案将使得美国的证券市场暴露在中国黑客的攻击威胁之下，因而极大地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表示，可能对这桩并购重新进行审议。

在这种高度敌视中国的大环境中，特朗普内阁很可能趁势对中国提高关税，乃至是施行 45% 的惩罚性关税。此外，华尔街金融家们也一致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财长，前高盛合伙人 **Steven Mnuchin** 肯定会借机火上浇油，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外界预期，**Steven Mnuchin** 将在今年四月的年中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中正式宣布这一决定。讽刺的是，尽管 **Steven Mnuchin** 宣称中国政府蓄意低估人民币，但中国政府正在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人民币继续贬值。

阻止对美投资、提高关税、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些加起来足够刺激北京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反击了。但华尔街的人们关心的是，中国具体会做出哪些反应？

经济学家 **Andy Xie**（谢国忠）大胆预测，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催化剂。他表示：“中国和美国一定会展开谈判。特朗普并不想挑起贸易战，他只是故作姿态，希望在谈判中谋求优势。”而圣地亚哥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 **Barry Naughton** 则表示：“中国的反应将是谨慎而有限的，因为中国需要顾忌诸多方面的事务。”他还指出：“中国迄今为止成功地让人们认为美国在中美贸易中扮演了最大的保护主义者的角色，而事实并非如此。统计数据指出，中国在诸多方面对美国企业和投资的限制，要更加保守，更加封闭。”

中国如果决定反击，从短期来看他们可能会削减采购波音客机，减少进口美国生产的大豆和玉米，并且谋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企业并购。

“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施加任何报复性关税，但中国无疑不会忍气吞声。”**Naughton** 补充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对所有企业都有影响力的国家。”

最近几个月来，一些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开始担心，北京会不会选择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不友善的贸易政策。但卡耐基世界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Michael Pettis** 认为，只要中国还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就别无选择，必须继续购买诸如美国国债的海外资产。

Pettis 还指出：“中国的资本流出规模速度令人惊讶，在过去两年内，中国的外储规模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中国政府总的立场是限制资本过快外流，因此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中国资本收购美国企业，那等于是选择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大连万达出资十亿美元收购 Dick Clark，这家工作室出品了包括《美国小姐》和《舞池争锋》在内的诸多电视节目。这桩收购在北京和华盛顿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一些保守派议员（如 Ted Cruz）认为这将使中国在美国的电影和文化产业获得不应有的重大影响力，美国必须予以限制；另一方面，消息也指出北京不希望此桩收购完成，因为这与中国政府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相悖。

面对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处境，中国企业也开始以退为进，谋求更加稳健的海外投资。例如：海航集团的陈峰最近收购了华尔街对冲基金 SkyBridge，而这家基金的创始人 Anthony Scaramucci 是特朗普政府的顾问。有传闻指出，海航集团谋求以此为契机，逐渐向美国市场发展。大连万达集团也谋求继续在美收购文化企业。

然而，在政策的大环境下，华尔街还是倾向于判断，尽管中美间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但跨太平洋并购的规模无疑会遭遇寒冬。

本文原题为“Wall Street Braces for Slowdown in US-China Deal Flow”。本文作者 Ronald Orol 为《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知名财经作家，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经济增长，路在何方？

Nicholas Crafts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众所周知，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陷入了普遍的增长停滞，但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却并未停止。那么，技术进步是否能继续推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欧洲国家又应该如何扭转其经济增长的颓势呢？全文如下：

现在看来，世界各国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情绪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弥漫的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悲观情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将目前的经济形势描述为“新常态”，并认为这种新常态将在发达经济体中长期持续下去。然而，正如过去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遭到了挫败一样，今天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可能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目前主流经济学界对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速预测之低，是近几十年来所未有的。与 1995 到 2007 年的水平相比，美国和欧盟的人均真实 GDP 增速几乎降了一半，乃至更多。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经济增速的放缓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每小时工作时间的单位产出）的下滑。要是与上世纪 50 年代的黄金水平对比，这种下滑就显得更致命了。经济下行会对发达经济体带来多种后果。从负面的角度讲，经济下行将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下滑，同时也可能拖累技术进步的速度。但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也意味着低利率的时代将长期持续下去，同时资本也会从发达经济体更多地流向投资机会广阔的新兴市场，这对于后进国家的经济赶超，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

不准确的预测

当然，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总是准确的。“长期停滞理论”的开创者 Alvin Hanse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1938 年的美国经济年会上，Hansen 指出当时世界的技术增长率远远不能满足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要求。然而我们都知道，没过几年，美国就迎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事实上，正当 Hansen 为经济增长的前景而担忧时，世界范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悄然增长。在半个世纪后的 1987 年，另一位广受尊敬的美国经济学家 Robert Solow 也指出：“虽然大家都在讨论计算机革命的美好未来，但我还看不到这对全要素生产率会带来哪些改善。”

基于近期各国的经济增长表现，今天弥漫在世界各国的悲观情绪，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 Hansen 的长期停滞理论。从统计数据来看，早在 2007 年世界金

融危机之前，各国的生产率增速就已经开始放缓了。生产率的增长对提高单位资本产出而言至关重要。尽管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一些经济增长并没有完全从 GDP 增速中表现出来，但经济学家基本都同意一点，那就是美国的经济下行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偏误，而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尽管统计数据非常糟糕，但我们还能看到一丝希望。在大萧条时期的 1929 年到 1941 年，美国的年均全要素增长达到了 1.9%，而劳动生产率增速则达到年均 2.5%，这意味着只要有良好的创新体系，严重的金融业危机并不一定会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创新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一百年前，电力的工业化应用和内燃机的大规模推广都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众所周知，美国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从办公室里的小小革新，到工业化生产中的重大改革，都在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一段时期以来，信息与通讯科技的重大进步都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但遗憾的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带来像过去那样大的提高。这启示我们，尽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其势头已经不再那么迅猛。

美国经济的表现有望超出预期

当然，我们之前的分析都是基于回顾历史的方法所展开的。或许，更前瞻性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乐观地看待美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起码有三个乐观的理由。第一，考虑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迅猛发展，许多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都可以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无疑可以大幅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许多研究都指出，如果在未来 20 到 25 年内机器人可以取代目前社会 40% 的工作，那么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将增加 2 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崛起将继续为全球的科技研发带来澎湃动力。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曾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而在 20 世纪，它成功转型为了全球科技进步的领头羊。如今，中国也有潜力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实现这一转换；第三，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革命将显著提高人类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而这也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在各个领域的技术进步。

与美国蓬勃向上的势头之相反，对于欧洲国家而言，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上追赶中美的步伐。从 20 世纪中叶至今，欧洲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 50 到 70 年代，欧洲迅速在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而在 70 到 90 年代，欧洲的实际 GDP 增速显著放缓，追赶美国的脚步戛然而止。这是欧洲国家的劳动时间和就业率双双下挫导致的，不过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在稳步上升的。然而，从

90年代至今，欧洲国家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也开始逐渐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到2007年，欧盟创始15国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不及1973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

社会能力是关键

欧洲的中期增长前景不仅取决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也取决于欧洲国家自身能够多快地从危机中复苏，并且重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势头。经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社会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赶超的关键因素。所谓“社会能力”，是指诸如税收制度和监管条例这样，可以激励企业加强技术方面的投资，并且更好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提高的制度设计。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能力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就好像在内燃机和流水线时代的社会能力，就很可能不能适应如今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要求，也不能完成其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使命。

欧洲在20世纪中叶经济的飞速增长，得益于战后的重建、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及欧洲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得益于对长期经济回报的重视。如今，上述因素早已荡然无存，战后的政治安排使得欧盟选择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巨量的转移支付，这使得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极高的税率，这极大扭曲了欧洲经济。

在2008年危机后，欧洲经济落后美国的趋势更加令人担忧。对于这一现象，一种来自美国学界的意见越来越被人们认同。这些学者认为，欧洲经济过于缺乏竞争，而同时又承受着过重的税负和过于严格的监管，这意味着欧洲缺乏社会能力。当然，欧洲国家的社会能力并不是第一天这样了，但是，考虑到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特征，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倚重于商业组织的重组，这也就使得欧洲的制度安排更加拖累了经济增长。在美国，低技术和低生产率的服务业企业将会被更先进的企业所替代，而在欧洲，由于严苛的监管和保护制度，这种先进企业对落后企业的淘汰就要困难得多。毫无疑问，为了实现经济的复苏和技术的持续进步，欧洲必须在社会能力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总的来说，美国和欧洲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种放缓未必会持续下去。技术进步对于未来的生产率提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技术的进步也是最难预测的。如果果断施行供给侧改革，并提高社会能力，那欧洲国家还是有望实现对美国的赶超的。然而，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欧洲的改革进程举步维艰。诚然，在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

下，欧洲国家还需要奋力前行，挖掘技术进步的增长潜力，从而实现赶超，以扭转逐渐落后于美国的颓势。

本文原题为“Whither Economic Growth?”。本文作者 Nicholas Crafts 为英国华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机遇

Victor Kummritz, Bastiaan Quast / 文 沈仲凯 / 编译

导读：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会。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制模式，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体系随时间的变迁。本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变迁主要由中低收入国家推动，而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另外，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低收入国家依然集中在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的领域。全文如下：

近些年来，全球价值链（GVCs）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但是，从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只关注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样本，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分析指标的选择上亦存在过于简化的问题。例如，现有研究常常使用“出口中，海外附加值成分占比”（foreign value added content of exports, 简称为“i2e”）或者“海外出口中，国内附加值成分占比”（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ent of foreign exports, 简称为“e2r”）来衡量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作用。但是，基于上述两个指标的分析往往会得到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模式并没有明显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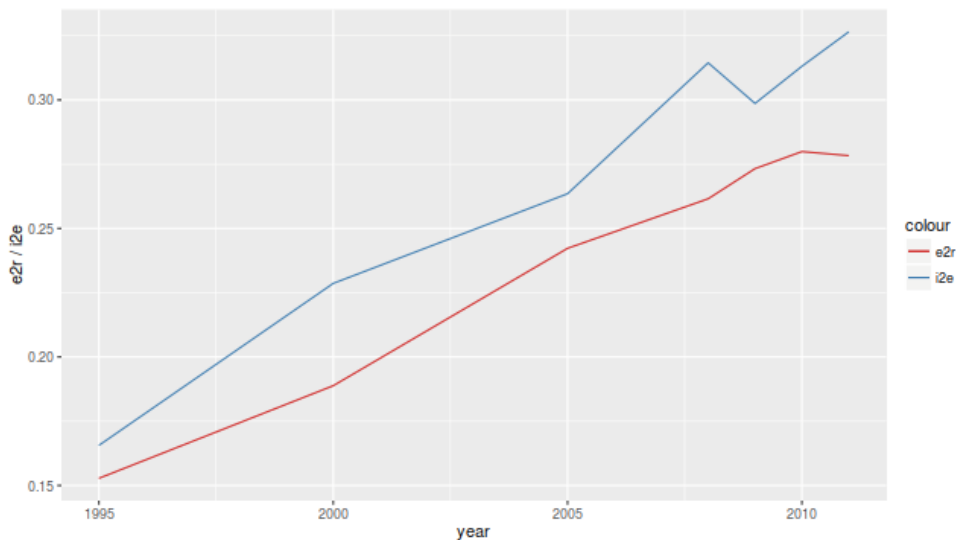
这一结论与基于现实的观察似乎并不吻合，而这很有可能是衡量指标过于简化的结果。学者 Wang（2013, henceforth WWZ）以及 Koopman (2014)等人的研究试图提出一套更为具体的分析指标，使我们能够更细致地观测与区分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整合模式与表现。本文利用上述两篇研究论文中的分析指标，结合 OECD 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 简称为“ICIOs”），对 61 个国家 1995-2011 年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家中包含不少发展中国家，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模式及角色提供了实证材料。

表一使用传统的 i2e 以及 e2r 指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两类国家在各个指标上的表现并没有明显差异。表一显示，发达国家出口中，国内附加值占比略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差异不明显。

Table 1 GVC integration by income group

Country group	<i>i2e</i>		<i>e2r</i>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Developing ²	23.46%	48.22%	20.35%	38.58%
High-income	22.64%	41.84%	21.85%	29.50%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1995年到2011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图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程度不断加深，具体表现为*e2r*以及*i2e*指标的逐年上升。

Figure 1 Developing countries' share in global backward (*i2e*) and forward (*e2r*) linkages

但是，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Wang 以及 Koopman 等人提出的一套新的分析指标可能可以让我们更为细致清晰地观测到全球价值链整合模式的国别差异。本文将使用如下几个指标展开分析：

- 1) 国内（海外）增加值中属于最终产品的成分占比，记为 $dva_fin(fva_fin)$ 。
- 2) 国内（海外）增加值中属于中间产品的成分占比，记为 $dva_inter(fva_inter)$ 。
- 3) 国内增加值返回占比，记为 rdv 。

其中， fva 可以理解为出口中，外国增加值份额；而 dva 以及 rdv 可以理解为出口中，国内增加值份额。

上述几个指标应满足如下公式：

$$1) \quad dva_{fin} + dva_{inter} + rdv = 1$$

$$2) \quad fva_{fin} + fva_{inter}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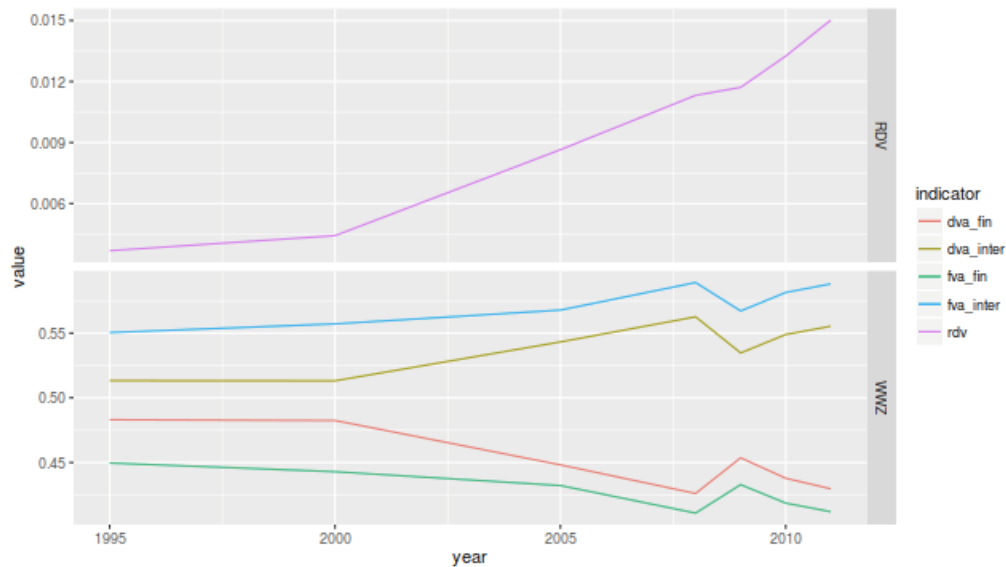
上述指标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整合中的不同角色。当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中，它们往往首先参与产业链末端的组装环节，然后再沿着价值链逐步向前端转移。以苹果手机的生产为例。苹果手机的绝大部分增加值都在发达国家产生，但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则在中国完成。因此，我们会观测到初始阶段中国的 fva_{fin} 指标会比较高，因为它从国外进口高增加值中间品，进行组装，再作为最终产品出口。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提升，它会逐步参与生产苹果手机中增加值更高的环节，甚至将最终的组装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去。这时，中国实现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转移，亦可以理解为产业升级。这体现为中国 fva_{fin} 指标的下降以及 fva_{int} 指标的上升。

表二展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上述五个指标上的表现。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在中间品环节上的贸易占比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具体体现为 fva_{inter} ， dva_{inter} 以及 rdv 指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 fva_{fin} 以及 dva_{fin} 指标低于发展中国家。

Table 2 WWZ decomposition results by income group

Country group	fva_{fin}	fva_{inter}	dva_{fin}	dva_{inter}	rdv
Developing	42.07%	57.93%	44.09%	54.73%	1.18%
High	39.38%	60.62%	40.73%	56.85%	2.42%

图二展示了发展中国家上述五个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模式在逐步向发达国家的模式靠拢，具体体现为 rdv ， fva_{inter} ， dva_{inter} 三个指标的逐年上升，以及 fve_{fin} ， dva_{fin} 两个指标的逐年下降。

Figure 2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WWZ indicators over time

进一步的，如下表三、表四、表五则分别展示了东南亚各国、拉丁美洲各国以及非洲各国的指标对比。从表三中可以看出，图二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向前端移动的趋势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高速发展。观察表四，如果将拉丁美洲各国的指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比，我们会发现拉丁美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整合程度较低，而哥斯达黎加以及智利的数据成为了拉丁美洲地区的两抹亮色。再看表五的两个非洲国家，突尼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程度相对较高，其整合模式类似于越南以及哥斯达黎加，体现为较高的后向关联以及向价值链前端转移的趋势。相对的，由于南非主要进行原材料贸易，较少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合程度相对较低，类似于阿根廷与哥伦比亚。

Table 3 WWZ decomposition results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untry	fva_fin		fva_inter		dva_fin		dva_inter		rdv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Cambodia	68.1%	35.2%	31.9%	-35.7%	64.5%	26.8%	35.5%	-27.5%	0.0%	-29.7%
Malaysia	39.3%	-9.0%	60.7%	6.3%	40.8%	-4.5%	58.9%	3.4%	0.4%	-21.5%
Philippines	35.5%	-21.7%	64.5%	16.0%	38.9%	-19.1%	60.9%	16.0%	0.2%	18.2%
Thailand	41.4%	-12.9%	58.6%	11.3%	47.4%	-14.6%	52.3%	17.7%	0.3%	20.0%
Vietnam	47.1%	-22.6%	52.9%	30.0%	55.0%	-9.0%	44.8%	12.7%	0.1%	103.4%

Table 4 WWZ decomposition results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ountry	fva_fin		fva_inter		dva_fin		dva_inter		rdv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rgentina	51.15%	-6.33%	48.85%	7.95%	51.92%	-5.71%	47.90%	7.01%	0.18%	49.61%
Chile	22.23%	-22.29%	77.77%	8.54%	24.61%	-23.44%	75.25%	10.03%	0.14%	81.25%
Colombia	39.41%	-19.09%	60.59%	15.30%	39.32%	-33.76%	60.55%	32.06%	0.12%	25.56%
Costa Rica	45.99%	-11.17%	54.01%	11.29%	50.97%	-17.88%	49.01%	24.97%	0.02%	43.05%

Table 5 WWZ decomposition results for African countries

Country	fva_fin		fva_inter		dva_fin		dva_inter		rdv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Average	Δ 95-11
South Africa	48.76%	-11.76%	51.24%	13.56%	54.43%	-14.60%	45.49%	21.41%	0.08%	7.07%
Tunisia	45.09%	-14.97%	54.91%	15.19%	56.62%	-4.47%	43.10%	5.56%	0.28%	147.59%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通过使用更为精确的指标体系就可以较好地展现出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整合情况的差异。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更为前端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往往是最终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体现为这些国家的 *rdv* 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下游的位置，体现为较高的 *fva_fin* 和 *dva_fin* 以及较低的 *fva_inter*, *dva_inter* 和 *rdv*。结合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的策略是将低附加值的下游产业外包到其他国家，再最终从其他国家进口组装完成的最终产品。当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整合模式随时间的推移变迁。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整合模式在逐渐向发达国家模式趋近。综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阻挡地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会在未来进一步加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

本文原题为“Global value chain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本文作者 Victor Kummritz 为 WTO 组织中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学者。另一位作者 Bastiaan Quast 是 UNCTAD 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经济的全球角色：联系、政策与溢出

M.Ayhan Kose, Csilla Lakatos, Franziska Ohnsorge 和 Marc Stocker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本文主要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检验美国经济增长，货币与财政政策，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以及经济政策对全球溢出的影响程度。本文从美国与世界经济在贸易、金融和商品市场上的经济联系，美国与全球商业和金融循环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溢出影响程度，全球经济对美国的潜在溢出渠道这四个方面入手，分析美国经济的全球角色。编译如下：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美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对美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1.美国与世界的联系

2016年，据估计，美国名义GDP超过18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权人和债务人，与其他发达国家在贸易与金融方面有很深远的联系。

1.1 贸易联系

2015年，贸易占据美国GDP的28%，虽然大大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0%，但是显著高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18%。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商业服务）的进口国和出口国。随着贸易自由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不断加深。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的大部分贸易实行最惠国待遇制度。美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是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2 金融联系

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市场是紧密相连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起者和接收者，2015年占据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的四分之一。欧盟、日本、加拿大和瑞士总共持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90%，其中欧盟和加拿大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方。美国持有欧洲、中东和非洲投资组合资产的最大份额，达到三分之一。

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中被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而且是世界最强势的储备货币。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只有在欧洲和中亚，欧元的使用规模超过美元，成为各国央行间跨境流动的主导货币。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使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超过30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国家的汇率盯住美元。

1.3 商品市场联系

美国是一个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例如，近年它已经再次成为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占据了全球石油生产的 13%（与二十世纪早期的比例相同）。相对于像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以石油为基础的主要碳氢化合物生产国，美国的生产几乎是平均分布在天然气和石油（EIA 2016）。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燃料生产国，占据了全球产量的 42%。

美国历来是农业、能源和工业品的主要消费国。但随着中国、印度，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一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美国的这一角色逐渐淡化。但美国仍旧是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国，占据超过全球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它也是第二大包括铝、铜、铅和咖啡等商品的消费国。

2.美国和全球的不同步周期

2.1 商业周期的同步

美国的商业周期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是高度同步的。这显现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全球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优势。而且，这也反映出全球经济波动会同时影响很多国家。

2.2 周期转折点的一致

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时，国际商业周期的同步性加强。在这个阶段后，其他国家 GDP 的增长和美国的周期紧密相连。例如，相对于美国经济处于衰退的阶段，在美国经济扩张时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高于平均水平。

1975 年全球经济衰退恰逢美国低产量和高通货的长期滞胀的开始。在 1982 年衰退时期，美国和一些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大幅度的衰退，紧随反通胀货币政策，美国的失业率急剧增长。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这是由美国抵押市场引起的。2008 年 5 月，雷曼公司倒闭后，真正演变成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有关 2001 至 2009 年美国最近的两次衰退的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的商业周期转折点具有一致性。尽管在二十世纪晚期互联网泡沫爆发后美国经济已经经历过一次轻微的衰退，但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相似的数据解释了美国商业和金融周期与其他经济体的同步程度。商业周期比金融周期更具有同步性：其他国家倾向于和美国有 80% 的相同的周期阶段。尽管，凭借经验检验美国经济是否会导致其他主要经济体商业和金融周期出现转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近调查显示，美国好像会影响一些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衰退的时间和时长（Francis et al.2015）。

3.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美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美国经济波动通过上述讨论的机制传导至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经济活动通过进口需求的增长可以直接提升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通过加强生产力贸易溢出间接促进他国经济增长。考虑到在全球商品市场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活动的加速有助于提升全球商品的需求和提高商品的价格。美国政策的变更被期望通过实体和金融渠道影响国内活动和形成广泛的跨境溢出。

美国经济的独立增长、政策或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的冲击会影响至国外并引起商业周期的波动（Levchenko and Pandalai-Nayar 2015）。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国内外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反过来会对全球长期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3.1 经济增长溢出

美国经济增长波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有广泛的影响。据估计，美国经济每增长 1%，将会带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 0.8 个百分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增长 0.6 个百分点，同时，全球（除美国）经济增长 0.7 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增长对一些经济体的投资冲击大约是两倍，北美自贸区成员（加拿大和墨西哥）尤其会从贸易溢出中获益。（Yifan and Abeyasinghe 2016）。通过商品市场的贸易影响是另一个传导渠道。

3.2 金融市场溢出

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直接资本流入和流出国。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美国主权债券收益率的波动往往密切反映在其他金融市场。相似地，来自美国股票市场的跨境溢出效应是十分显著的，相对于双边投资组合流动的实际规模来说，这更多地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开放水平（Ehrmann, Fratzscher, and Rigobon 2011; Rose and Spiegel 2011）。这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和投资者的信心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Ehrmann and Fratzscher 2009; Arteta et al. 2015; Rey 2015）。

由于美元被广泛的应用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所以美元汇率的波动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美元升值往往恰逢银行去杠杆化，更严峻的全球金融状况，更大的金融危机发生率和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先前的经验表明，如果美元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升值时期，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量美元短期债务会因展期、利率风险和外汇流动性枯竭而变得脆弱。

3.3 货币政策溢出

通过影响国内活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和资本市场，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的跨境影响是非常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适

逢资金加速流向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反过来，美国更高的利率会减少资金流动，提升全球利率，尤其像银行这样的中介机构。

尽管真实的或预期的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更会影响美国 and 全球长期收益率，但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来说主要依赖于内在驱动力。面板变量自回归模型被用来分析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实体或货币冲击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不同影响（Arteta et al. 2015）。这个模型包括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工业产量、长期债券收益率、股票价格、名义汇率、双边汇率和通货膨胀。货币和真实的冲击作为外生变量。

结果显示，如果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在美国经济强势发展的背景下，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净影响是积极的。它会尤其加强股票的估值和活动，明显降低货币压力。另外，如果金融市场受美国不太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资产价格和资金流动渠道会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产生不利影响。

未被预期的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对资本流动的最终影响也依赖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市场的反应，尤其是这些经济体的市场参与者如何评估货币政策预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每增长 100 个基点，向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资本流动就会减少 20-45%，伴随着 G4 经济体的长期债券收益率在这个范围上限内同步增加。

3.4 财政政策溢出

美国财政政策变更将通过影响美国对外进口需求、汇率波动或信贷环境来产生国际溢出效应。模拟联邦储备委员会模型，可以得到，GDP 的 1% 财政刺激方案可能会在两年后导致美国经济增长 0.7% 至 1.5%。然而，财政刺激对提升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暂的，中期运行依赖于政策实施的环境。

财政乘数——由美国开支或减税产生的额外的产量，依赖于经济低迷的存在、货币政策的反应和财政措施的环境（Laforte and Roberts 2014; Brayton, Laubach, and Reifschneider 2014; Whalen and Reichling 2015）。特别地，如果他们采取的减税形式或措施支持政府开支和基础设施投资，财政刺激措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短期的财政刺激和一致的减税政策的联系通常是可以估计出的，即便考虑到这些估计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得到的（Chahrour, Schmitt-Grohe, and Uribe 2012; Jungqvist and Smolyansky 2016; Whalen and Reichling 2015）。关于个人收入减税，经验表明，财政乘数为 0.3 到 1.5 不等（Whalen and Reichling 2015）。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减税结构和财政资助的方式（Gale and Samwick 2016; Zidar 2015）。

据估计，公共基础设施开支对美国活动有更大的短期影响，财政乘数在 0.4-2.2 之间（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2; Bivens 2014; Whalen and Reichling 2015）。这反映出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直接影响——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进口开支对私人投资和生产力的积极影响。

美国财政宽松对跨境溢出存在积极影响，提升美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需求，加快全球经济短期增长。然而，一些因素也会减少积极影响，包括政府开支抵消效应削减和汇率与金融环境的波动。

伴随着以美元为主的债务的增加，美元进一步升值和美国财政刺激措施会引发对于财政稳定性的经济担忧。然而，经验表明，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和美元优势是混为一谈的。如果美国财政刺激导致了更高水平的美国公众长期债务，这也将会造成全球利率提高和由于紧缩的财务状况成为不利的跨境溢出的来源。

3.5 不确定性溢出

由金融市场的波动或政策规模和方向的模糊引起的不确定性的增加，降低了美国投资者的热情，因为他们的长期投资决策是基于稳定的融资条件。由于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阻碍了美国、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出口与投资的增长。

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一定与政策不确定性相一致，但是二者都会导致投资的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这是一种新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方式（Baker, Bloom and Davies 2015）。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增加 10%，一年后，美国产量增长降低 0.15 个百分点，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产量增长降低 0.2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降低 0.6 个百分点。

4. 全球经济对美国的溢出

正如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也受到与其他国家的联系程度的影响。而且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对于带动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4.1 全球贸易

2015 年，贸易占据了美国 GDP 的 28%，制造业产出占据了 GDP 的 22%。大部分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至加拿大、欧洲、墨西哥和中国，加起来一共占据美国出口的 60%。

4.2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很多美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紧密相连。美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代表美国出口附加值体现在其他国家上。“向前参与”体现在机器、商业、服务和电力方面；“落后参与”更多的会受到限制。然而，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进口占据出

口的 20%，包括服装和皮革产品、机动车、计算机和电力（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11）。

4.3 跨国公司

很多全球价值链活动是通过跨国公司和他们的附属机构完成的。虽然美国的跨国公司占据美国所有公司数量的不足百分之一，但自 1990 年以来，它们贡献了美国实际 GDP 增长的三分之一，和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0）。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美国跨国公司主要依赖于出口和进口。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出口商是跨国公司（Moran and Oldenski 2016）。美国贸易总额的 43% 发生在跨国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联系中。

4.4 全球金融

在过去的十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逐渐加强，这可能会导致双面溢出效应。金融市场的压力或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急剧下降会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不小的压力（IMF 2013;2014）。美元的显著升值，可能是由于日益不同的货币政策与其他储备货币引起的，会削弱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美国一定规模的财政刺激也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4.5 消费者和劳动力市场

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消费支出是商品，其中约六分之一是进口商品。进口的份额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最大，尤其是耐用的家居设备、机动设备和休闲产品，还有服装和鞋子。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移民（Chandy and Seidel 2016）。2015 年，移民平均占据了美国平民劳动力的 17%，而且在美国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四分之一。

4.6 全球对美国的溢出

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多维联系，美国商业周期和全球商业周期是同步的。全球发展对美国商业周期有重要影响。而且，源自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的冲击，对美国经济活动有十分显著的影响（Bem, Johnson, and Yi 2010）。

5. 结论

本文全面概述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经济增长、货币和财政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的改变对全球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填补了以往相关文献的空白。本文主要强调了这些问题：美国经济发展对其他国家的主要传导机制？全球溢出冲击多大程度来自于美国？全球经济对美国有多重要？

本文原题为“the global role of the U.S. economy: linkages, policies and spillovers”。本文作者 M. Ayhan Kose 为世界银行集团的董事，Csilla Lakatos，Franziska Ohnsorge 同为经济学研究学者，Marc Stocker 为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Working paper 1706。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脱欧对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Simeon Djankov/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 本文认为, 英国脱欧将给伦敦金融城带来负面影响, 从银行业、保险和再保险业、资产管理、和清算业务等方面评估了伦敦金融城将会遭受的损失, 长期来看, 影响是巨大的。同时, 作者对英国政府究竟能否履行之前提出的各项承诺持怀疑态度。编译如下:

英国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决定脱欧, 这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结果。2017 年 3 月底, 英国将触发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 启动脱欧程序。商业人士们对此表示担忧, 脱欧将给伦敦金融城带来负面影响。银行家们表示一旦开始脱欧, 他们将离开伦敦金融城, 因为欧盟客户和市场将不再自由流动。

据 Oliver Wyman (2016) 估计, 伦敦金融城将损失高达 180 亿英镑的收入、3 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的分析表明, 其中收入损失的 15%、就业损失的 3% 来自伦敦金融城。其他机构的评估数字在同一量级, PwC (2016) 估计损失 140~200 亿英镑收入、7 万就业, EY (2017) 估计损失 8.3 万就业。总结下来, 脱欧将直接使伦敦金融城损失 12%~18% 收入、就业率下降 7%~8%。

宏观层面, 脱欧带来的早期影响并不显著: 英国 GDP 下降 0.5 个百分点、就业下降 0.2 个百分点。而英国财政部在 2016 年 4 月估计损失 380 亿英镑收入、23 万就业。这一结果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出现。

本文结构如下: 第一节列出伦敦金融城成为全球金融之都的关键事件。第二节讲述伦敦金融城的收入和税收规模, 该城市的几个主要的金融行业板块及其重要性。第三节在假设与欧盟谈判不顺利的情况下, 粗略估计了脱欧可能带来的影响。第四节总结指出, 如果英国为了阻止金融机构离开, 实行金融自由化, 将面临哪些风险。

1. 伦敦金融城的形成

1672 年, Richard Hoare 成立 Hoare 银行, 是英国最古老的银行。1690 年, John Freame 成立 Barclays 银行, 两年后 John Campbell 成立 Coutts (顾资) 银行。

一个世纪后, Francis Baring 于 1792 年成立了巴林 (Baring) 银行, 将业务范围从羊毛贸易拓展到国际贸易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上。1798 年, Nathan Mayer Rothschild 在伦敦成立了第一家国际银行的分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伦敦分行, 该银行起源于法兰克福, 在 5 个主要的欧洲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 使得在不同国家买卖债券兑换货币而获取收益成为可能 (Ferguson 1998)。这些机构为国际银行奠定了基础 (Polanyi, 1944)。

又过了一个世纪，伦敦已成为一个大型首都，需要具有全球性的金融管理能力。到 1913 年，英国人口为 4.12 亿，占全球人口的 23%（Maddison 2001, 97）。大量政府、私人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专业人才，伦敦金融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和人才汇集地。

二战后，英国经济一片废墟，不得不向美国借款 35 亿用于战后重建。伦敦失去了原有的金融中心地位。1950s 年代，伦敦在金融规模和服务上仅能与巴黎、法兰克福相当，远远落后于纽约（Kennedy, 2011）。

1960s 年代，伦敦银行率先引入欧洲债券，伦敦开始吸引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律师。1980s 年代的“金融大爆炸”让伦敦金融城重回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电子交易方式取代了过去传统的面对面谈价，“金融大爆炸”重点在于三项改革：取消证券交易的最低固定佣金限制（鼓励竞争），取消经纪商和交易商两种职能不能互兼的规定（允许合并和收购），允许外国企业控股本国券商（对外开放）。

“金融大爆炸”效果显著，在 1999 年欧元被引入后，伦敦成为欧洲金融业务的中心。法律咨询公司等服务业发展迅速，得益于欧元计划和欧洲本土市场的强盛，欧洲最大的 15 家律师事务所都将总部设在伦敦。

除了早期金融机构的出现和“金融大爆炸”改革之外，伦敦金融城还有一些其他优势。第一，它是一个时区：伦敦的交易日开始于东京市场收盘时、纽约市场开盘前。第二，英语在全世界普及，所以伦敦比法兰克福、巴黎或米兰更有优势。第三，英国具有公平而高效的法律体系，便于来自多国的企业间公平交易。第四，伦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吸引和培养国际人才。

以上这些成就了伦敦金融城的今天，在 2017 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伦敦金融城位居榜首，纽约和新加坡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欧洲的金融中心还有苏黎世（第 9）、卢森堡（第 12）、法兰克福（第 19）、慕尼黑（第 27）和巴黎（第 29）。

2. 伦敦金融城的规模和构成

本文评估英国脱欧对伦敦金融机构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参考顶尖咨询公司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本文认为脱欧对伦敦金融城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

本文中的伦敦金融城定义为大伦敦地区的金融业，包括“一平方英里”、金丝雀码头和伦敦西区。本文基于 2015 年、2016 年金融业收入和税收数据分析英国脱欧的直接影响。

我们首先了解伦敦金融城的行业和服务，如何互相联系，而这些取决于伦敦的商业环境。

首先，我们列出数据表明伦敦金融城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伦敦约占英国 GDP 的 7%，雇佣了 106 万名员工，其中约 1400 家金融机构由外资控股，这些外资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伦敦金融城，2013）。很多欧盟成员国企业的总部设在美国（IMF，2016a）。外资成功引入归功于“金融大爆炸”改革（IMF，2016b）。伦敦金融城还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地。

a. 银行业

伦敦有 250 家外资银行，比纽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多（TheCityUK, 2016）。全世界约 1/5 的银行业务登记在英国。欧盟的护照制度允许金融机构在所有欧盟成员国进行交易。很多欧盟外资银行把总部设在伦敦，然后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这种起源于欧盟的银行约有 102 个（根据使用护照制度的企业数量估算）。

银行业中，最大的板块是零售和商业银行，约占银行业总收入的 55%，占银行业就业的 82%（表 1）。第二大板块是销售和贸易，占银行业收入的 30%，占银行业就业的 11%。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分别占银行业收入的 10% 和 5%。

表 1 金融服务的子板块

	收入（十亿英镑）	增值（十亿英镑）	税收（十亿英镑）	就业（千）
银行业	109	66	30	560
零售和商业银行	62	40	18	460
销售和贸易	30	15	8	60
投资银行	12	7	3	15
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	5	4	1	25
保险和再保险业	41	32	14	325
资产管理	22	17	6	45
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	28	18	10	130
交易、清算和经纪业务	4	2	1	10
证券服务	4	2	1	35
技术、数据及其他	20	14	8	85
所有金融服务	200	133	60	1060

注：本表给出一个数字而非数字范围作为最初的分析报告。

来源：Oliver Wyman（2016）；PwC（2016）。

不同板块之间差别很大，零售和商业银行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主要针对国际市场，其中 2/3 的收入来自外国客户；约 14% 的投资银行收入登记于伦敦分行，这其中有一半是欧洲投资银行业务。

如果英国成为独立的市场，投资银行业受到 MiFID II 和 MIFIR 的限制，这两项条约将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生效。该条约限制除欧盟国家以外的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进行投资服务和业务，包括投资组合管理、投资咨询、投资交易等。

脱欧前后，伦敦银行业的主要区别在于监管标准的不同，这一监管标准包括数据保护、资本监管等。例如，如果英国金融机构遵循 WTO 规则，对位于欧盟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所要求的资本是不同的。

b. 保险和再保险业

伦敦金融城有约 600 家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业务涵盖了寿险、非寿险、综合保险以及劳合社等(IMF 2016b, 18)。保险业收入约占伦敦金融城总收入的 20% (表 1)，雇佣 32.5 万员工，其中有 11.4 万人直接就职于保险公司(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2016)。每年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保险业务达 40 亿英镑 (ONS, 2017)。

英国的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以子公司的形式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经营，而非分支机构，这样就避免了护照制度的影响，因此英国脱欧不会带来成本大幅增长。而伦敦劳合社则不同，目前伦敦劳合社可以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而没有存款或保证金的要求。不过这一业务仅占总保费的 11%。

Solvency II 规定了护照制度如何运行，它涵盖了所有保险业务。它规定除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在再保险业拥有与欧盟成员国同等的权利，但在保险业上有区别。所以，以子公司的形式在欧盟成员国开展保险业务的风险更低。

c. 资产管理

伦敦金融城管理着 45% 的欧洲资产，约 6.9 万亿英镑。其中的 18% 是欧盟客户，另外 15% 是非欧盟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收入、税收和就业分别占伦敦金融城总收入、总税收和总就业的 11%、10% 和 5%。资产管理公司直接雇佣的员工 4.5 万名，还有 4 万人是承包商或咨询顾问 (Investment Association, 2016)。

伦敦金融城中，养老基金是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资产 1.9 万亿英镑。接下来分别是保险基金(9600 亿英镑)，商业资产管理 (4800 亿英镑)，私人财富经理 (4170 亿英镑)，对冲基金 (2450 亿英镑) 和私募基金 (2100 亿英镑)。

伦敦金融城是欧洲最大的对冲基金中心。位于伦敦的 800 多项基金管理着欧洲 85% 的对冲基金资产(TheCityUK, 2016)。伦敦金融城还是欧洲最大的私募基金中心，在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雇佣约 8000 名员工。

欧洲的资产管理业务条约为 UCITS 和 AIFMD，这两项条约都没有给除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家平等的权利，这会使伦敦资产管理业务在英国脱欧后变得艰难。

d. 清算业务

伦敦金融城是全球外汇交易结算中心，外汇交易占全球 3/4，其次是巴黎（11%）和法兰克福（7%）。伦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场外交易”（OTC）外汇衍生品和利率衍生品交易市场。其中的基础设施板块的收入、税收和就业分别占伦敦金融城的 2%、1.6%和 1%。通过同一清算交易所进行清算业务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清算业务遵守的条约是 EMIR，该项条约同样没有赋予除欧盟以外的第三国国家平等的权利，因此英国脱欧将对这一行业影响较大。

3.英国脱欧可能造成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产业组织一直在论证英国脱欧将对其金融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英国政府仍坚定脱欧立场。

本文只讨论与欧洲市场有关的业务和份额，亚洲、中东等其他国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各行业按照受到影响的大小排序依次是银行业、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资产管理以及保险和再保险业。

本文假设英国脱欧后失去了其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同等权利，与欧盟不再自由贸易，而是遵守 WTO 条例。与欧盟相关的 50%的业务、3 万个就业岗位以及 30~50 亿的税收将会受到影响（Oliver Wyman, 2016）。到 2020 年，英国将损失 140~200 亿收入、70~120 亿增值以及 7~10 万就业岗位（PwC）。EY（2017）估计，英国脱欧后，8.3 万人将面临失业。

本节的讨论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基础：欧盟市场失去的业务怎样被新业务所取代。

a. 银行业

零售和商业银行的大部分是国内业务，因此不直接依赖于护照制度。据估计，约 250 亿英镑收入，约 23%的零售和商业银行业务与欧盟有关。银行业最有可能受到的影响是运营成本的增加以及开设海外子公司的需要。这样一来，小型银行要么考虑离开伦敦金融城，要么互相联合起来进入欧盟市场。大型银行将在承担高成本的情况下开展欧盟市场业务。

b. 保险和再保险业

由于大部分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在欧盟国家成立了子公司（FCA, 2016），因此受到的冲击较小。据估计，欧盟市场收入约占该行业总收入的 75%，约 40 亿英镑。英国脱欧将导致 1/4 的收入流失。

c. 资产管理业

资产管理业中，欧洲市场约占 25%，约 60 亿英镑。受到 UCITS 和 AIFMD 的影响，该行业企业进入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都将受到限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就是建立海外子公司，这将产生昂贵的费用，操作也更复杂。1/3~1/2 的欧盟业务将流失，20~30 亿英镑。

d. 清算业务

英国脱欧将给该行业造成沉重打击，1/2 的业务将受到影响，约 110 亿英镑。欧元清算业务很有可能转移到欧元区国家。

e. 溢出效应

英国脱欧的长期影响更加广泛，因为金融辅助业各版块（包括会计、审计、法律、管理咨询、房地以及其他专业服务）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成为凝聚伦敦金融城的向心力。参考 2014 年英国投入产出表估计，金融辅助行业 15%~20% 的业务将受到消极影响，约 170 亿英镑收入。

重要的是，在一段过渡期内，由于企业将考虑重组等，对管理咨询、法律等行业的需求可能有所增长，不过这将伴随过渡期结束而消失，过渡期要持续多久很难预测，本文并没有考虑这一因素。

4. 结论

本文认为，英国脱欧将给伦敦金融城带来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可能会重新审视其金融监管政策，吸引外商投资。但这一政策变化将引发其他国家的政策竞赛，从而影响整个全球金融系统。同时，英国过渡期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可能出现的变化将不利于新业务的开展。

最大的不确定是，英国政府究竟能否履行之前提出的各项承诺：在不影响财政的前提下，企业税收能否降低？移民制度改革能否留住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大学的人才？在不降低外资吸引力的前提下，高管薪酬和企业决策透明度改革能否实现？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化几乎都不可能发生。

本文原题为“[The City of London after Brexit](#)”。本文作者 Simeon Djankov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加利亚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金融市场集团的董事。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新秩序下的欧洲

Maria Demertzis, Andr  Sapir 和 Guntram Wolff /文 杨茜/编译

导读：特朗普政府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贸易后，欧盟面对自身霸权地位下降的角色转变，为维护多边体系应采取哪些政策。本文首先探索美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第一”方向的原因。然后讨论美国新兴政策的核心要素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最后讨论欧洲在维持多边体系和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应该如何应对。编译如下：

议题

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和双边投资伙伴，一直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欧洲一体化，为欧盟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但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有所下降。美国新政府似乎有意用双边贸易取代多边主义。在贸易方面，它旨在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双边贸易赤字和保护美国制造业。在气候政策方面，美国在“巴黎协定”上的承诺受到质疑。在国防方面，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似乎比以前更不确定。这一转变是基于“美国第一”的主旨。

政策挑战

欧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得益于多边体系。如果美国未来采取与先前不同的政策方针，欧盟应该采取四个部分的战略：（1）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捍卫世界贸易组织；（2）与中国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欧盟应加速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条约的讨论；（3）改革贸易治理，解决内部失衡，提高欧盟的对外信誉。（4）准备好应对美国的双边政策，包括与世贸组织相容的反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

发达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从 20 年前开始逐渐减弱。这一趋势在 2010 年左右更加明显，当时发达国家在购买力方面占全球 GDP 的不到一半。由于全球贸易份额不断下降，其他发达经济体开始呼吁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全球的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安全性和是否有能力进行新的贸易交易方面。相比之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过去 20 - 25 年间得到了提升。

特朗普“美国第一”的背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建立，支持和监管全球体系方面发挥了明显的领导作用。这种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感被认为是有益于美国的。但特朗普认为，多边制度没有惠及美国公民。多边系统虽然被视为有利于金融部门，但却极大损害了制造业。

特朗普指责贸易的实际工资停滞主要在制造业，并打算将高薪的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因此，他在总统竞选上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引入保护主义措施来纠正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制度。现任政府大力削弱美国作为全球多边系统锚点的作用，采取了诸如关税之类的保护措施。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出通过“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量税”（DBCFT）来恢复美国贸易平衡。这将对所有进口征收 20% 的税，同时对出口产生的收入提供特别免税。这种税收方法被称为“边境调整”。

DBCFT 将对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征收，并将作为对进口的罚款和作为出口的补贴。与增值税不同，它歧视外国生产者，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进口征税和出口补贴都将使美元升值，抵消掉税收在促进出口和减少进口方面的好处。当然，税率和美元价值的上升是否完全抵消，仍然不确定，因为汇率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DBCFT 将显著增加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如美国）的税收。

除了税收，特朗普总统似乎还把双边而不是区域或多边贸易协定视为增加美国利益的首选工具。在他看来，双边协议可以将美国在谈判中的杠杆作用最大化，有利于减少贸易赤字。

美国新政府的新战略将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深远的影响。欧盟和美国之间在服务贸易上关系更加密切，欧盟和美国是彼此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44% 的美国 FDI 来自欧盟，31% 的欧盟 FDI 来自美国。欧盟对美国贸易措施的反应将取决于措施的规模及其对欧盟经济的影响。

欧盟如何维护多边体系

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威胁了全球贸易体系，甚至使世贸组织陷入危险。这自然地引起其他全球参与者，特别是欧盟和中国的不满。

多边贸易体系对欧盟来说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对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开放程度，欧盟（43.8%）远高于中国（22.1%）和美国（12.6%）。保护主义会减少欧盟福利，损害全球增长。

尽管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但它不能维持一个强大的多边系统。欧盟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一部分是由于内部原因（经济状况，国防和安全政策薄弱），另一部分是由于外部原因（世界平衡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日益增长在改变）。

与此同时，世界正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演变成一个更多极化的体系，以中国，欧盟和美国三国为贸易点，每个体系都有多个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虽然欧盟和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但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制

度相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更加不同。欧盟还应寻求其他合作伙伴的合作来支持世贸组织。

加强与合作伙伴的贸易关系

在战略上，欧盟应继续与其他伙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谈判。双边协议的设计应作为多边体系的垫脚石而不是障碍，其最终目标是将世贸组织扩大为“WITO”（包括投资）。

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中，国有企业（SOEs）是欧盟和中国谈判的核心。双方应同意使用公共法院系统解决其双边投资争端（如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而不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系统。他们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多边投资框架。中国欧盟双边协议的目的应该是提高市场准入和高环境、公司治理、消费者安全和工人权利的标准。BIT 本身应确保公平竞争和投资条件的互惠。

欧盟还应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集团寻求新的双边协议。目标是以加强全球系统的方式进行交易，并确保欧盟公民的高标准。

欧盟需要在内部加强对外的信任

为了使欧盟在维护多边主义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在三个领域进行改革。

首先，解决国内分配问题是进行新贸易安排的先决条件。许多欧盟国家仍需要改革其社会制度，以实现包容性增长。欧盟的主要作用应该是通过有效打击与单一市场相关的逃税和社会欺诈，使其成员能够实现所需的再分配水平。

第二，欧盟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治理变得繁琐。最近签署 CETA 的困难使合作伙伴更加怀疑欧盟的交付能力。我们认为欧盟机构必须重拾公民的信任，采取包括改革欧洲议会等措施来确保更大的合法性。

第三，欧盟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不能持续经营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大量盈余，特别是德国的盈余，是欧元区失衡的结果，而欧元区的失衡需要全球环境来解决。加强德国国内需求至关重要。国家层面的结构性改革，例如解决债务过剩等将进一步增加需求。在盈余和赤字国家进行改革将加快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强化欧元，从而也有助于解决欧元区盈余的问题。

欧盟应该采取哪些双边行动

虽然未来的欧盟改革可以在新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制定新的趋势，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应对潜在的敌对美国政府。

我们认为，欧盟对美国单方面措施的反应是维持多边贸易体系。如果美国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对高于美国最惠国待遇（MFN）关税的墨西哥进口商征收关税，这将违反美国的 WTO 义务。欧盟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将直接受到影响，他们应该向世贸组织提出投诉。

如果美国引入一种明显违反 WTO 规则的 DBCFT 形式，欧盟应再次与其他 WTO 成员合作，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例如，对企业税务采取只针对美国的对等措施。另一种方法是针对美国对欧盟的出口采取反补贴措施。

结论

美国是欧盟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伙伴。但是，如果美国政府采取与欧盟相对立的政策措施，欧盟需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欧盟应优先考虑有助于维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措施。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联盟，特别是中国，这对于保护多边贸易体系是重要的。加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除贸易和投资外，欧盟和中国也可以就环境和气候问题密切合作，以确保其他国家不要放弃在“巴黎协定”下的承诺。

欧盟本身需要改革。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必须通过减少外部贸易顺差和加强国内增长来解决其内部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应该与其建立怎样的关系。特朗普的到来减少了双方在英国脱欧上的相关损害。欧盟和英国是在贸易，气候和金融监管等领域支持多边体系的伙伴，双方的协议应保护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权衡能力。

最后，欧盟竞争力依然较弱，不仅是因为内部分裂，而且还因为它依赖于能源进口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

本文原题为“Europe in a new world order”。本文作者 Maria Demertzis 是 Bruegel 的副主任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客座教授。André Sapir 是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的大学教授和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untram Wolff 是 Bruegel 的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法是错误的

Caroline Freund/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改变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式。其目标是结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低估，从而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贸易协定，也就是减少赤字。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方法是错误的，存在很多缺陷。编译如下：

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改变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式。其目标是结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低估，从而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贸易协定，也就是减少赤字。这个提议可以被称为“替代性计算”，但事实上，它和曾由白宫提出的臭名昭着的“替代性事实”是一样的。

新的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最近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信中提出了拟议变更的理由，他声称人口普查局的贸易数据“通过将外国产品计算为美国出口来夸大出口”。他认为，进口后再出口却没有增加附加值的商品不应该被计入出口额。

将这些所谓的再出口与总出口分开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使用这种数据进行贸易差额计算却是有问题的。原则上，在出口方面排除那些进口又出口到海外但在美国没有任何增值的货物是说得通的，但是对于贸易平衡的计算而言，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你必须进行双向比较。新的计算方法将把再出口从出口数据中扣除，却从不从进口数据中扣除，结果则是误导性地扩大了贸易赤字。

纳瓦罗在辩护他提出的改变时说，“你不能管理你无法精确测量的事”。美国公众更加担心的是基于数据的错误决策的可能性。提高数据质量总是重要的，人口普查局和负责编制经济数据的其他机构努力收集和分发最准确的数据和统计结果。但是关于数据的决定应由这些机构的专家做出，而不能被政治化。白宫对标准经济计算的干预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即降低所有美国经济统计的可信度，且限制了决策范围。

特朗普政府提议的关于计算赤字的变更还有其他方面的缺陷。

排除未增值的再出口。双边赤字不重要。

纳瓦罗有意排除双边赤字中的再出口，以便能更准确地得到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的增加值，但他提出的计算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贸易以总额减去再出口来计算，这并不能改变对赤字的度量。例如，如果加拿大向墨西哥出口汽车零件，墨西哥将其装配成汽车和船只运往美国，那么美国可能与墨西哥发生贸易逆差，并与加拿大出现盈余，即使进口汽车价值的95%来自加拿大。

贸易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正在探索新的方法来估计“增值”贸易，以便更好地了解供应链。但将再出口从贸易中排除并不会增加对供应链理解的清晰度。在上面的汽车示例中，没有一个贸易流量被定义为再出口，但墨西哥对美国的增值出口（汽车价值的10%）与其国内出口（汽车的全部价值）有巨大的差别。

政府对双边赤字的定义令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经济学家不同意总贸易赤字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对双边贸易逆差的担忧是错误的。

普遍接受的经济分析认为，总贸易余额等同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但双边赤字没有这一定义。对双边赤字的关注是政治性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一些国家总是可能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产品，就像一些企业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商品一样。

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纳瓦罗的提案无法付诸实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数据无法匹配。简单来说就是，进口数据无法与出口数据对应。下面我们介绍人口普查局提供的五个贸易数据系列是：

- **总出口**：所有从美国出口到外国的货物。
- **国内出口**：在美国增值的、出口到国外的货物。
- **再出口**：曾进入美国海关辖区的、在出口时与进口时“基本相同”的外国原产货物。再出口等于出口总额与国内出口之间的差额。
- **一般进口**：来自国外的货物的实际到达总量。
- **进口消费**：通过美国海关清关的货物总量。

目前，贸易赤字通过总出口减去一般进口来计算，而替代性计算则是用国内出口减去进口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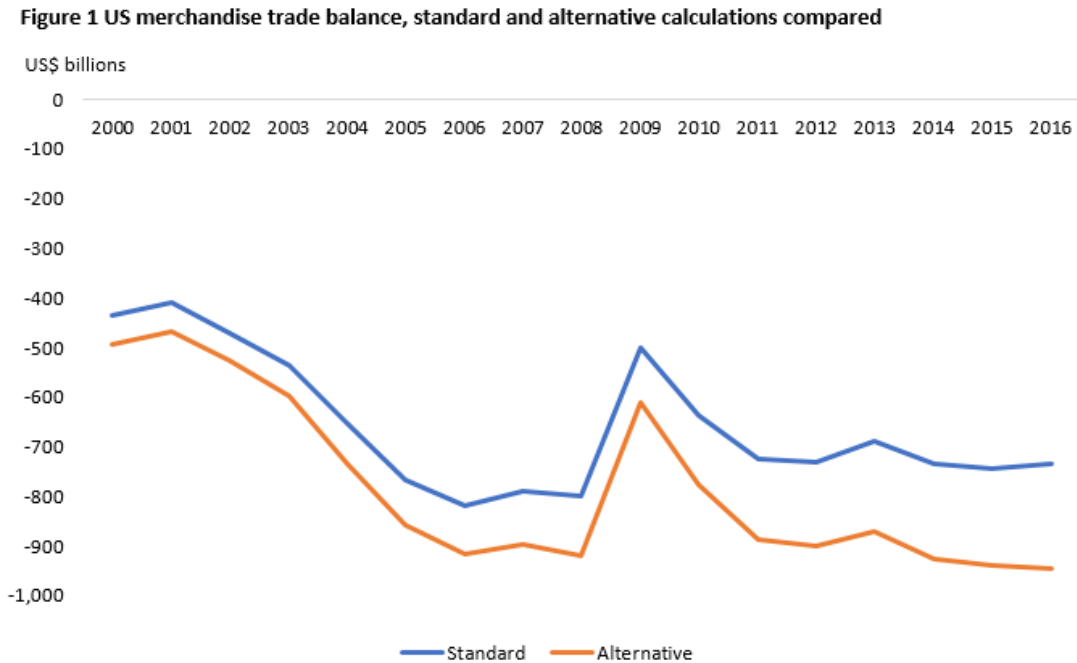
鉴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假定一般进口和进口之间的消费差异与再出口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一般进口和进口消费之间的差距比总出口和国内出口之间的差距小得多。简而言之，再出口不能完全通过使用进口数据来得到。

由于海关当局无法知道进入美国的货物是否将被消费或再出口，进口消费被夸大了。该类别的更准确的标签将是“通过海关的进口货物”。一些其他国家将此类称为“特殊进口货物”，这也可以帮助避免任何误解。

如果在进出口数据中准确记录再出口，则替代方法将产生与现有贸易差额相同的总贸易余额。可以通过总数据来比较标准计算和替代性计算之间巨大的偏差。。

使用当前的方法，2016年美国商品赤字总额为7,350亿美元。行政当局提出的方法则将使赤字达到9,460亿美元。并且，偏差在不断增长。尽管2005年商品贸易逆差较大，但两种方法之间的差额低于1000亿美元，而今天却超过2000亿美元（图1）。将这些数据用于双边贸易平衡意味着将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之间分配2000亿美元的假赤字。

图1 美国商品贸易赤字，标准计算和替代性计算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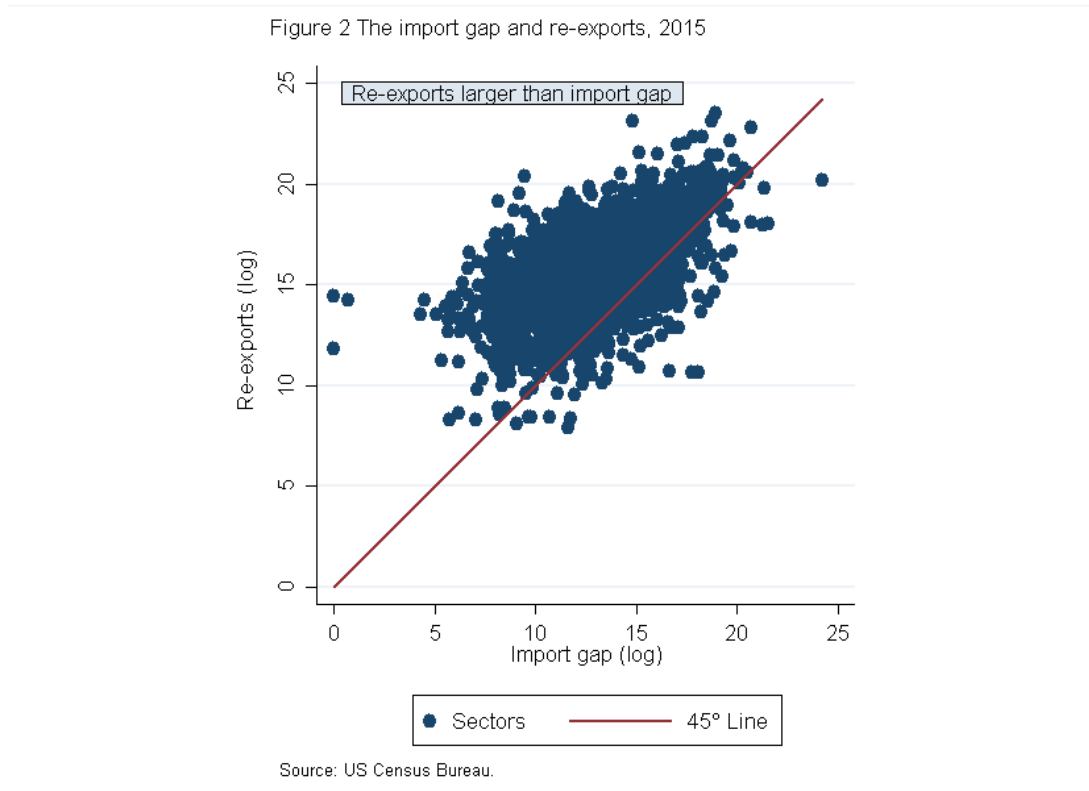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这是只限于少数商品产品的问题吗？

图2显示了对5000多种进口产品而言，再出口与使用一般进口和进口消费计算的差距。如果大多数产品的消费进口准确测量，这些点应落在45度线上。相反，大多数点都在上面，表明如果“进口消费”的数据是准确的，再出口可能要大得多。

图 2 进口差额和再出口的比较，2015 年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通过检查进口与再出口贸易之间差距最大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答案。这些是通过海关进口到美国，但被用作出口而不是消费的产品。表 1 显示了前 30 个产品，它们合起来占这两种计算方法之间的差异的一半。

Table 1 Top products, by share of import/re-export gap

Product	Share
Diamonds, nonindustrial, worked	8.02
Communication apparatus (excluding telephone sets or base stations); machines for the reception, conversion and transmission or regeneration of voice, images or other data, including switching and routing apparatus	5.61
Parts & accessories for calculators, cash registers, and related machines	5.61
Telephones for cellular networks or other wireless networks	3.56
Jewelry; of precious metal (excluding silver)	2.51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processors and controllers	2.47
Paintings, drawings and pastels; executed entirely by hand	2.02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portable, with a keyboard and a display	1.91
Units of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storage units	1.86
Medical, surgical, or dental instruments and appliances; n.e.c	1.77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n.e.c.	1.68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memories	1.17
Units of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processing units, n.e.c.	1.11
Telephone sets and related apparatuses and their parts	0.96
Electrical static converters	0.95
Printing machinery; parts and accessories, n.e.c.	0.80
Vehicles; with only spark-ignition internal combustion reciprocating piston engine, cylinder capacity over 3,000 cc	0.77
Medicaments; consisting of mixed or unmixed products n.e.c.	0.75
Medical,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appliances; catheters, cannulae, and the like	0.75
Boards, panels, consoles, desks, and other bases; for electric control or the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ity, for a voltage not exceeding 1,000 volts	0.59
Electrical apparatus; plugs and sockets, for a voltage not exceeding 1,000 volts	0.55
Stones; rubies, sapphires, and emeralds, worked	0.53
Electrical apparatus; miscellaneous parts	0.52
Insulated electric conductors; wiring sets used in vehicles, aircraft, or ships	0.45
Reception apparatus for television	0.45
Taps, cocks, valve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for pipes, boiler shells, tanks, vats, or the like, including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led valves	0.42
Electrical apparatus; photosensitive, including photovoltaic cells, light-emitting diodes	0.42
Sculptures and statuary; original, in any material	0.42
Vehicles; with only spark-ignition internal combustion reciprocating piston engine, cylinder capacity over 1,500 but not over 3,000 cc	0.42
Medical,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appliances; electro-diagnostic apparatus, n.e.c.	0.42
Total share	49.46
n.e.c =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此列表中的顶级产品是钻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市场，美国也是一个分销中心。处理过的非工业钻石是进口的，其中的许多会再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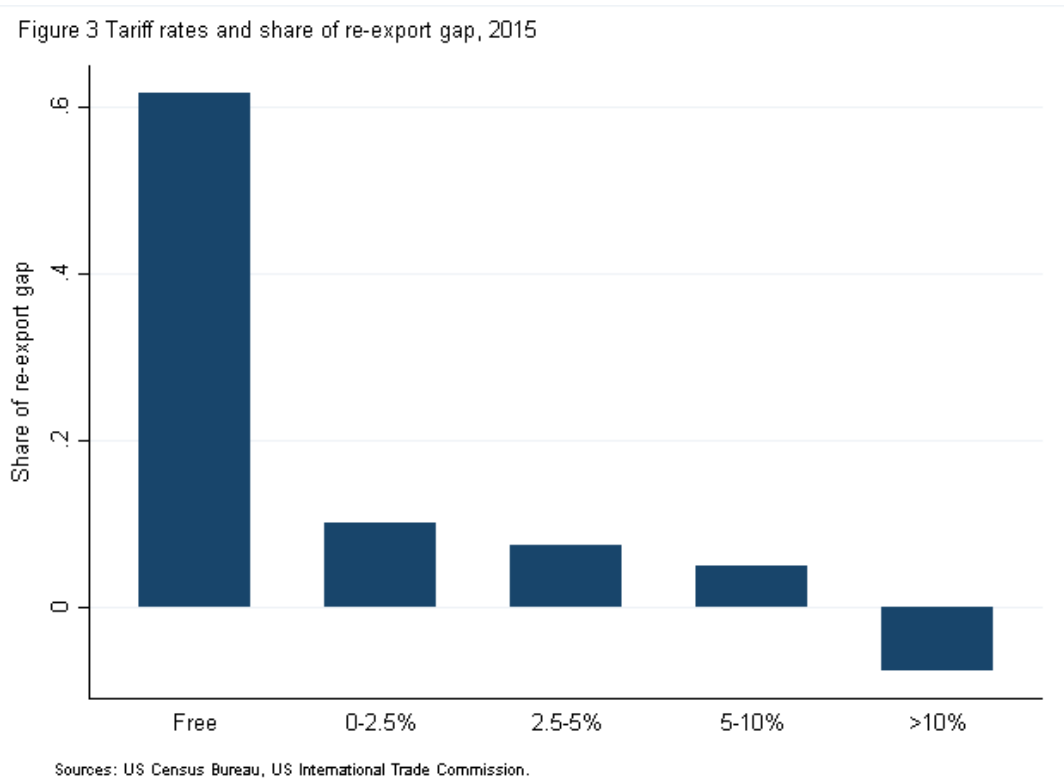
为什么钻石只能通过海关才能再出口？钻石的关税是零，所以没有任何成本。其中一些可能会被稍微修改，如评估或抛光。由于钻石不是在美国生产的，它们的状况没有被美国生产商显著改变，因此它们被视为再出口。其他宝石，如红宝石和祖母绿也在顶级产品的名单上，此外还有艺术和首饰。对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来说，由于时间和鉴赏，数据的分歧也可能出现。如果钻石进入美国一年，价格上涨了，然后出口，升值就会发生在美国，但即使在美国产生了投机收益，该项目仍然属于再出口。

除了宝石，其他产生很大差异的产品与供应链贸易有关。例子包括机器部件，半导体和汽车配线组。为什么这些产品通过海关只是为了再出口？大公司将所有产品都运到同一个地方，特别是在区域供应链中，然后分发它们，可能会更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该列表中的所有产品都包含一些在美国会增值的部分，即物流和服务。这些价值也有助于创造工作岗位。

表中大多数通过海关的大型再出口货物都是零关税的，因此利用美国物流是有好处的。图 3 显示了每个关税比例下的产品，其再出口与进口差额在总的差距中所占的份额。62% 的价值来自零关税产品，另外 10% 的税率低于 2.5%。虽然可以对进口后再出口的货物征收关税，但这一过程很复杂。

图 3 2015 年关税税率和再出口份额之间的差距



再出口的增长与制造供应链还是宝石贸易相关呢？

两者都是。表 1 中的许多产品也是再出口增长的原因。表 2 显示了增长最大的产品。再出口贸易在宝石和零部件方面都在增长。

Table 2 Top products by growth in re-exports, from 2005 to 2015

Product	Share of growth in re-exports
Machines for the reception, conversion, and transmission or regeneration of voice, images, or other data	9.65
Diamonds, nonindustrial, worked	8.91
Telephones for cellular networks or for other wireless networks	6.86
Civilian aircraft, engines, and parts	5.89
Processors and controllers,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4.24
Jewelry and parts thereof	3.30
Parts & accessories for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3.29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n.e.c.	2.85
Instruments & appliances for medical, surgical, dental and vet. activities, n.e.c.	2.53
Portable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weighing not more than 10 kilograms, consisting of at least a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a keyboard and a display	2.28
Memories,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1.98
Parts of phone sets & other appliances fo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1.74
Paintings, drawing and pastels by hand	1.69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storage units, n.e.c	1.38
Parts & accessories of printers, copiers and fax machines, n.e.c.	1.36
Static converters; automatic data processor power supplies	1.26
Digital processing units, n.e.c.	1.19
Boards, panels etc. for electric control, for voltage not exceeding 1000 volts	1.09
Medical needles n.e.c., catheters and parts etc.	0.95
Nucleic acids & salts; other heterocyclic compounds, n.e.c.	0.87
Medicaments n.e.c., measured doses, n.e.c.	0.82
Rubies, sapphires and emeralds, otherwise worked	0.81
Reception apparatuses for TV not designed to incorporate a video display	0.77
Parts for electrical apparatuses n.e.c.	0.75
Electric conductors not exceeding 1000V, with connectors, n.e.c.	0.72
Total share	67.19
n.e.c =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最准确的统计方法仍是标准计算方法

上述结果表明，进口消费不应用于计算贸易赤字。最准确的方法是总出口减去总进口。虽然集中于国内出口可能有助于查看美国生产商对增加值做出贡献的产品，但这些数据不能与进口消费的数据结合起来，以计算总体或双边贸易平衡。这样做产生了总计 2000 亿美元的夸张的贸易赤字，这在双边计算中一定会被错误地归于某处。

综上，新提议的贸易赤字计算方法可能会导致有偏的统计结果，但作者认为，即使使用现有的标准方法统计的双边贸易赤字额，也已经足够大以至于特朗普政府可以将此问题政治化。

本文原题为“The Fallacy of Trump’s Alternative Trade Calculation”。本文作者是 Caroline Freund，她是 PIIE 的高级研究员，并且曾担任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的首席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什么是 NAFTA？，离开 NAFTA 之后，美国贸易会怎样？

Chad P. Bown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NAFTA 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约定消除三国之间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认为 NAFTA 使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减少，以美国退出做筹码威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按照他的喜好达成新的协议内容。但有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 NAFTA 对美国工人工作机会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若美国退出 NAFTA，将会带来难以预测的经济影响。全文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对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出警告，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重启 NAFTA 谈判时，没有按他的喜好缔结新的协议，美国将可能宣布退出。

为了更好地理解 NAFTA 及其未来走向，以下是您可能需要了解的五个要点：

1. NAFTA 涉及三个贸易合作伙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 1989 年签订生效的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USFTA）基础之上，加上墨西哥形成。

乔治·布什政府参与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乔治·布什最终于 1992 年 12 月 17 日代表美国签署了该协定。当乔治·布什失去连任后，新当选的克林顿总统对协议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以确保其通过 1993 年国会审议。

2. NAFTA 削减进口税——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性损失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约定所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零。这使得三国之间的贸易量得到极大的增长。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贸易总额从 1993 年的 2,91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1 万亿美元，增长了 267%。267% 的增长率看似很多，但这期间美国与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 242%。

因此，经济学家也不确定 NAFTA 带来的具体影响，因为至少有其他三个主要的全球性变化在同时发生。

首先，当美国在 1995 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下的墨西哥实行贸易关税削减的同时，也对大多数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关税消减。第二，同一时期，中国重新加入了全球经济，并成为主要

出口国。第三，技术进步，如互联网、信息和通信技术、自动化，改变了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制造业。

经济学家 Shushanik Hakobyan 和 John McLaren 曾经记录了美国工人社区因为 NAFTA 导致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的情况。然而，即便忽视 NAFTA 对美国出口相关的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劳动力造成的冲击仍远小于自动化等其他原因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工作的减少。墨西哥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冲击”带来的影响。

NAFTA 不是造成失业主要原因。无论如何，重新建立有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能帮助失去工作的工人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3. 特朗普对 NAFTA 不感冒，原因令人困惑

贸易争端无法解释特朗普对 NAFTA 的敌意。过去，华盛顿、渥太华和墨西哥城三方通过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诉讼了数十起案件。然而这些案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已经解决了牛、猪、牛肉、西红柿、小麦、玉米、糖、软饮料、葡萄酒、金枪鱼、木材、钢铁、水泥和电信服务的争端。在 WTO 诉讼的这些争端都没有达到能威胁 NAFTA 存在的级别。

所以，仅参照之前的争端诉讼，NAFTA 另外两个成员国很难判断为什么特朗普对 NAFTA 反应如此激烈，也无从了解什么是特朗普的区别以往的谈判策略。

目前只能从特朗普的 Twitter 中看出一些端倪，似乎特朗普的公开意见集中在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逆差。他已经使用 Twitter 号召开利、福特和通用汽车等已经建立或移动生产设施到墨西哥的公司，停止此类行为。同时，特朗普不时威胁墨西哥，称要对墨西哥征收 35% 的进口关税和其他类型的边境税。

4.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内容：投资，劳工和环境标准

从 NAFTA 协定签订之初，它的某些条款就存在无法让人认可的情况。这其中有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克林顿政府于 1993 年就职，在 NAFTA 中商定了两项新的协议。关于劳动和环境的这些协议达成时，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民主党相比，更多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劳动合作协议（NAALC）是美国贸易协议发表劳工标准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为了安抚有关的美国工会，因为与墨西哥的协定将引发一场底层工人的竞争并使美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恶化。然而，工会担心 NAALC 仍然存在重大问题。他们担心工人组织谈判、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不能通过贸易制裁的方

式在墨西哥实施。没有强制力量干涉，美国工人害怕墨西哥劳动者更低的工资会降低美国工人的竞争力，并给美国工人带来损失。

克林顿的第二个妥协是北美环境合作协定（NAAEC）。作为环境团体，NAAEC 也有缺陷：它被设计为一个合作和对话的论坛。它没有提供诉讼和贸易制裁手段作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环境进步的工具。

第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方式授予外国公司权利。假设墨西哥政府将墨西哥城的通用或福特汽车工厂国有化，或实施了一项环境或劳动法，仅适用于墨西哥的美国设施，而不适用于墨西哥的竞争对手。那么，根据 ISDS，美国公司可以起诉墨西哥政府。社会评论家认为 ISDS 是不透明的，并为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国内投资者没有的权利。

奥巴马总统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TPP 通过贸易制裁使更多的劳动和环境规定“可执行”。它还试图改进 ISDS。但 TPP 不仅限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它扩大了覆盖范围，包括跨越太平洋沿岸的九个其他国家。

5.最初的 NAFTA 出现倒退

如果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他贸易协定可能会启动。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都是世贸组织成员，最坏的情况是三个国家必须向所有其他世贸组织国家提供相同的进口关税。

当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时，新美国关税可以增加至平均 3.5%。美国出口商将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加拿大的进口关税将增加到 4.2%，墨西哥将增加到 7.5%。

如果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商实施的 WTO 关税高于美国对墨西哥出口商的关税，那么一个不对称的结果将会产生，而这似乎与特朗普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对立。事实上，关于关税的唯一完全对称或“公平”的协议似乎就是在现有 NAFTA 下每个国家适用的零税率。

如果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可能恢复他们 1989—1993 年期间 CUSFTA 规定相互授予的零关税。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在彼此之间实施 NAFTA 的条款。

但在劳动力、环境或外国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会发生什么仍然不太清晰。与关税，劳动和环境不同，美国与墨西哥的任何其他贸易协定都未将以上方面包括在内。美国与墨西哥也没有一项双边投资条约，以保护美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投资。

特朗普是否会借用 TPP 的劳动、环境和投资条款到 NAFTA 重新谈判？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也只是是特朗普政府待解决的众多大问题中的一个。目前能确定的是特朗普要求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倡议使得三个国家的国际商业利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本文原题为“[What Is NAFTA, and What Would Happen to US Trade without It?](#)”。本文作者 Chad P. Bown，是 PIIE 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白宫国际贸易和投资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最近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影响*

宋泓/文

导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执政理念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从其执政理念出发，分析了特朗普的贸易及相关政策取向、实现的可能性及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从特朗普执政理念出发，分析了其贸易及相关政策取向、实现的可能性及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贸易政策将会从长期坚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转变；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将会增加，但也存在深化合作的可能性。美国贸易政策的这种变化是一个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值得观察。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贸易政策 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 贸易摩擦

2016年美国大选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的胜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竞选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以及精英人士们对他连篇累牍、毫不顾忌的批评、甚至谩骂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世界的不满和抵制。现在特朗普已当选并将就职，我们如何面对？他的贸易政策目标是什么、能否实现、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贸易政策的影响如何、思路有何不同？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本文的思路如下：首先，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中寻找他的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贸易和其他政策；其次，分析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目标以及实施的可能性，并总结出其贸易政策的主要变化；再次，分析这些政策变化的影响；最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选择，并作出评判。

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及其贸易和相关政策

2016年11月2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过视频公开宣布其执政理念和执政百日将要采取和实施的政策。其中，“美国优先”（Put America first）成为明确的执政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不论是在炼钢、造车还是在治疗疾病方面，希望下一代的生产与创新发生在美国，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

* 宋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

表 1 汇总了特朗普竞选总统以来倾向、甚至宣布将要采取的直接以及间接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政策。

表 1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以及相关政策

排序	直接和间接的贸易政策	竞选期间宣称的政策	竞选获胜后确认的政策	能否实现政策目标	实施的可能性
1	反对和退出 TPP	○	○	○	○
2	重新谈判 NAFTA 以及其他双边协定	○	○	?	?
3	退出 WTO	○		×	×
4	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		×	×
5	降低公司所得税	○	○	?	○
6	能源市场改革	○	○	○	○
7	留住美国公司		○	?	○

说明：1) ○表示肯定，×表示否定，?表示不确定；2) 此表只汇总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政策，其他政策没有涉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种报告汇总。

在贸易政策方面，首先，特朗普政府将要发表一个通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特朗普认为，该协议对于美国来讲，将是一场（潜在的）灾难。其次，美国将和其他国家磋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以便将工作岗位和产业重新带回美国。在能源领域中，特朗普也要废除种种限制，以创造成千上万的高水平、高增加值就业机会，等等。总之，特朗普政府贸易和经济政策的

主线将是：“美国优先；就业至上；重构美国的中产阶级（rebuild our middle class），重建伟大的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2016年11月27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将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从35%降低到15%，并引发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抗议（12月1日）；11月30日，公开劝阻凯利（Carrier）公司海外外包活动，通过税收优惠以及取消母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合同威胁迫使该公司将外包活动留在美国。

实际上，这些举措也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核心。在竞选期间，沿着同样的逻辑，他还提出了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甚至也要重新谈判一些现有的双边协议；要清退非法入境的劳工，在美墨边境建立围墙；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特朗普的贸易及相关政策能否实现其目标、实施的可能性如何？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表1中的七项政策。

第一，退出TPP。TPP的签署和实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是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形成。TPP的标签之一，是为下一代的贸易和投资确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仅涉及到边界之上的市场准入和各种限制，更牵扯到边境后影响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各种规制。在TPP之下，如果各成员国内的规则环境都相同了，对于贸易和投资也都开放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区域内的货物和贸易都可以自由流动；其次，更重要的是，投资甚至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这样，各成员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会按照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跨区域、甚或全球化进行¹。

那么，这样的跨区域、甚或全球化经营活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以TPP中优先开放的电信、金融、保险和航空快递业等为例。美国电信产业的生产和服务提供活动，可以大规模地转移到海外进行——一方面就近满足当地的需求（供应海外市场，并且如果当地的市场足够大的话），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海外供应美国市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以及美国电信业的开放（虽然尚未达到TPP所期望的程度），已经使得该

¹ 这时，各地之间的贸易成本主要由地理上的差别造成（比如，地理上的距离以及便利性），各地之间的比较优势也主要由各地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产业的经营活动大量外包，整个产业处于逆差状态。其中的计算机服务，自金融危机期间的 2008、2009 年以后，更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每年都超过 100 亿美元。同样地，金融、保险和航空快递业中的开放和规制环境改善也会带来类似的变化。

另外，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也会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而发生很大的改变。1999—2008 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比例不断提高，金额也不断增加：从 1999 年的 13% 和 180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7% 和 420 亿美元。² 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一方面会带来更多的专利特许收益，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更放心地在海外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从事研发活动，从而，导致高附加值工作岗位的流失。

即便是通过劳工、环保规则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平等竞争，但是，地理上的限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会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工资率的巨大差别。因此，同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跨国公司一定会更多地选择成本更低、且经营环境规范、稳定的地区来进行³。这样，TPP 下的新规则和制度安排，不仅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导致工作机会、尤其是高附加值、高薪的工作机会的流失。从事同样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一个研发人员的工资，在印度，只是在美国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进行呢？

其二是市场的开放。贸易开放的就业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1) 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应的进口竞争所造成的就业效应。贸易开放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会得到扩张，劣势产业会得到抑制、甚至淘汰，从而带来就业效应。但是，在发达国家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高端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领域中。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代替、高端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的调整中，总体就业机会的减少是难免的。2) 生产效率提高所造成的就业效应。贸易开放后，国际分工的扩大，专业化程度以及熟练程度的提高

² Zhou, "Drivers of Globalization of R&D Investment by U.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Industry-Level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8, No. 2; 2016.

³ 根据美国劳工部“国际劳工比较”提供的数据，2009 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只是美国的 2%~3% 左右，<https://www.bls.gov/fls/country.htm>[2016-12-21]。另外，根据 Myhiringclub.com 发布的报告，2015 年，中国和印度 IT 研发人员的工资只是美国的 1/3 左右，<http://tieba.baidu.com/p/4069321560>[2016-12-21]。

都会增进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就业需求。⁴与现有的 FTA 安排相比，TPP 所实现的市场开放更彻底、范围更加广泛：在货物领域，自由化的产品达到了 99%，在服务领域，也远远超出现有 FTAs 以及 WTO 服务贸易协定的水平。

总之，TPP 形成的是未来的规则，以及未来的市场开放。退出 TPP，不会对美国现有的海外市场机会造成影响，却能阻止新规则的形成和更进一步的开放，以及基于这种规则和开放之上的区域化、全球化趋势，避免美国企业和产业、尤其是服务业进一步向海外转移。但是，退出 TPP 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在经济方面，退出 TPP 标志着美国放弃了为新的贸易和投资确定国际规则的领导力。更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方面，TPP 还是美国重返亚太、巩固联盟的重要抓手。退出 TPP 将使得群龙无首的亚太盟友们无所适从，也为潜在的竞争者提供了弥补空缺的机会。尽管特朗普信誓旦旦地要退出 TPP，但是，长远来看，能坚持多久，是否会以不同形式重新回归仍值得关注。

第二，重新谈判 NAFTA 及双边贸易协定。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促进就业和产业留在美国，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其一，与现有的情形相比，能够大大增加美国的出口机会，从而带动出口部门的扩张以及就业的增加。⁵

这里，现有的情形是指：美国通过 WTO，和 164 个成员确定最惠国关税，并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同时，通过 14 个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和 20 个国家确定特惠关税安排。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机会，首先，必须锁定这些机会，不能恶化；其次，要进一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就 NAFTA 的重新谈判而言，现有的开放水平已经很高了。以货物贸易为例，美国农产品出口值的 97.5%、工业产品出口值的 100% 在加拿大市场都是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值的 94.4%、工业产品出口值的 99.1% 在墨西哥市场上也都是零关税。这方面能够改进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在服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也类似。而在新议题以及规则方面，美国通过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参与 TPP

⁴ 在谈论贸易所引致的就业机会减少时，现在大家引用比较多的一个研究，就是 David 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3(6):2121-2168。该研究认为：1999-2011 年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不足 20% 由来自中国的进口所引致，其他 80% 以上的工作岗位的流失则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致。但是，这个研究中的很多假设都存在问题，估计出的中国进口影响也被夸大。

⁵ 也就是说，双边贸易扩大所导致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从而就业减少效应为出口部门的扩张所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所完全冲抵。

谈判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甚至扩大了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市场机会。因此，重新谈判 NAFTA，在退出 TPP 的条件下，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包装 TPP 的成果，放在双边协定的框架之中而已。

在双边贸易协定方面，美国目前生效并实施的双边协议只有 12 个，另外有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 NAFTA，以及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的多米尼加-中美洲（CAFTA-DR）自贸区协议，共涉及 8 个国家。因此，潜在的双边谈判伙伴还很多。表 2 列举了美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情况。

表 2 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以及所面临的关税

主要市场	双边进口		贸易多元化程度		平均的 MFN 关税		优惠幅度	零关税进口	
	百万美元		95%的贸易分布		在全部关税税则中			总税则	价值
			HS 2 位码	HS 6 位码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		
农产品									
1. 中国	2013	25,365	17	31	15.4	11.2	1.8	7.4	5.6
2. 加拿大	2013	21,256	27	254	22.4	12.0	5.8	91.7	97.5
3. 墨西哥	2013	19,557	30	406	22.2	38.4	37.3	96.0	94.4
4. 日本	2013	14,518	30	324	22.0	19.1	0.0	23.0	36.2
5. 欧盟	2013	12,163	28	168	14.7	4.7	0.0	14.0	49.2
非农产品									
1. 加拿大	2013	212,581	59	1,267	2.5	2.2	2.2	100.0	100.0

2. 欧盟	2013	200,485	65	1,388	4.4	1.5	0.0	24.0	66.1
3. 墨西哥	2013	163,907	69	2,350	8.8	7.7	7.5	99.4	99.1
4. 中国	2013	120,416	56	888	9.0	5.0	0.0	8.8	36.5
5. 日本	2013	54,081	63	1,066	3.0	0.7	0.0	55.5	84.8

资料来源：WTO 网站，Tariff Profile。

其中，除了加拿大之外，美国尚没有和中国、欧盟、日本和墨西哥签订双边协定。但是，实际上，通过 NAFTA，与墨西哥相当于签订了这种协定，通过 TPP 谈判也相当于与日本签订了双边协定。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与欧盟进行了双边的 TTIP 谈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只有与中国尚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谈判。⁶理论上讲，与保护水平较高、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签订高水平的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出口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因此，中国应该是特朗普政府优先选择的双边谈判对象。但是，与中国等新兴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难度也很大。比如，这些新兴大国是否会同意和美国进行这种双边谈判，即便同意，是否能够达成特朗普满意的协定，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也都无法确定。⁷并且，是否应该、能否实现基于“对等的、互惠性的”基础之上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也有很大的疑问。⁸

这样，即便是采取了一些锁定现有多边以及区域贸易协定开放水平的措施，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形式，特朗普政府⁹也很难实现美国出口贸易的实质性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⁶ 美国一些贸易专家给出的中美签订双边 FTA 的路线图是：先谈判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其次是双边贸易协定。

⁷ 大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一般都比较缓慢，短则五六年，长则数十年。有多少协议能够在特朗普任期内完成并发挥作用呢？

⁸ 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产业发展水平不同，贸易的保护水平也应该有所差别。这就是与比较优势理论同等重要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与公平贸易一起，它们一起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

⁹ 至少是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

其二，稳住现有的区域、甚至全球生产网络规模，阻止美国公司的进一步产业转移以及业务外包活动，不增加就业岗位的流失。如果有可能，进一步阻断某些现有的区域、甚或全球性生产网络的联系，促使部分产业和企业回流本土，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

美国企业和产业已经充分参与到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从 1960 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就开始在美墨边境地区开展“客户加工工业”活动，并在随后几十年中，逐渐建设成 NAFTA 下的北美生产基地；在亚太地区，也是美国企业最早从事电子产品的分包活动。在 1980 年代中后期，更是在微软和英特尔公司的推动下，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温特主义”（Wintelism）革命，推动计算机产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使得传统的垂直一体化战略过时，并带动整个世界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现在，在美国不少产业中，存在着很多只经营品牌和营销、或者研发和设计的“虚拟公司”，其他活动都分包在世界各地进行，前者如耐克公司，后者如苹果公司等。

因此，通过双边贸易谈判，一方面，可以推进与重点国家的市场开放，另一方面，限制和约束多边基础之上的规则形成，以及区域、甚或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价值链的构建。这样，即便是通过双边的谈判，尤其是与中国、墨西哥等国家的双边协议，能够直接增加的出口市场也有限。但是，却能够将这些国家的区域、甚或全球加工、组装、制造基地的角色大大弱化，从而稳住美国产业和企业的进一步区域化、全球化的步伐。

第三，退出 WTO。WTO 所代表的是一个以规则¹⁰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国际分工形成；更重要的是，最近 30 多年以来，也有利于区域、甚至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构建，并引发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而空心化。特朗普要退出 WTO，从某种程度讲，就是为了退出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阻止美国企业和产业从事基于这种秩序之上的区域、甚或全球价值链构建活动，以留在国内。

另外，退出 WTO，还要在国外市场上面临更高的准入壁垒。比如，就货物进口关税而言，一个国家的一种商品（一个关税税则），通常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税率：一般进口关税、最惠国进口关税以及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下的特惠关税。其中，前者最高、特惠关税最低（大多数情况下为零），最惠国关

¹⁰ 这种规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自由贸易（渐进地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性原则以及差别待遇原则等。

税处于中间水平。WTO 成员都享受最惠国关税。如果退出 WTO，而又没有和这个国家签署双边或者区域贸易协定，就要面临一般进口关税。这样，美国的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就会受到消损，从而出口量下降，就业减少。特朗普的办法是通过双边贸易谈判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利用美国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迫使其他国家作出不低于 WTO 最惠国关税水平的承诺。实际上，和美国签署双边协定的国家，绝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都已降为零。¹¹

但是，退出 WTO，美国却会遭受巨大的代价。首先，需要和现有 164 个 WTO 成员中，没有签订双边协定的 151 个成员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个工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投入很多的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¹²其次，以 WTO 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是美国倡导和领导建立起来的。退出 WTO 会使得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以及信誉大打折扣。因此，更可行的选择是，留在 WTO，但同时和重点国家（中国和墨西哥等）进行双边贸易谈判，限制基于多边规则之上的区域化和多边化的急速推进。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退出 WTO 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对于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分别征收 35%和 45%的关税。从国内程序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¹³但是，这样做，并且，在美国没有退出 WTO 的条件下，中国或者墨西哥（WTO 成员）可以在 WTO 中进行起诉，并在 WTO 裁决后采取反制措施。如果美国退出了 WTO，那么，这些国家则可以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从而，爆发贸易战。这样，在前一种情形下，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两败俱伤，适得其反。¹⁴只有在墨西哥和中国忍气吞声，不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条件下，才会带来美国贸易平衡的改善，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显然，墨西哥和中国政府不会坐以待毙。

但是，为什么特朗普会提出这样极端的政策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他对于中美以及美墨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北美区域生产网络

¹¹ 比如，表 2 中，向 NAFTA 成员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所面临的关税水平。

¹² 即便是特朗普能够连任，八年时间中，也很难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每年需要签署将近 20 个双边协定！）。

¹³ 根据美国 1974 年贸易法案，总统可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全面征收 15%的关税，但是时间不能超过 150 天。1971 年尼克松总统曾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过 10%的关税。另外，如果某个国家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则美国总统和政府可以对来自该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¹⁴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估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Marcus Noland, Gary Clyde Hufbauer, Sherman Robinson, and Tyler Moran, “Assessing Trade Agendas in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iieb16-6, 2016。

（墨西哥是制造基地）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国是制造基地）非常不满。全面提升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进口产品的关税，就可以隔断这种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阻止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向外转移。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挑起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而采取直接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优惠美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国内措施则效果要更好一些。

第五，降低企业所得税比率，从目前的 35%降低到 15%。长时间以来，由于企业所得税较高，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在海外避税港注册虚拟公司进行纳税，并将大量的利润滞留在海外。比如，2015 年，《财富》美国 500 强公司中的 298 家在海外滞留收益达到 2.49 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滞留海外的利润就高达 2149 亿美元，辉瑞公司（Pfizer）1936 亿美元，微软公司为 1240 亿美元，通用电器公司（GE）为 1040 亿美元。¹⁵据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利用海外税收天堂所规避的美国联邦税收高达 1000 亿美元。2015 年，在海外有收益的 298 家美国《财富》500 强公司的公司所得税率估计为 6.2%，比美国国内的税率低了 28.8%，相当于少交联邦税 7178 亿美元。以苹果公司为例，2015 年，该公司在海外留存收益 2149 亿美元，只按照 5%的公司所得税上缴了税收。如果按照美国国内的公司所得税（35%）纳税，那么，苹果公司就逃避了 653.88 亿美元的联邦税收。¹⁶因此，这些企业的逃税，以及高额利润的海外滞留，不仅侵蚀了美国政府的税基，而且也减少了在美国国内的投资活动，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吸引美国企业和海外巨额利润回归国内，虽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至少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单方面降低公司所得税率，会在发达国家之间引发竞争。在 OECD 已经出台《处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报告¹⁷，并且经 G20 协调，全球 61 个国家都在采取行动的情形下，特朗普的激进降税行动无疑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第六，废除繁文缛节，扩大能源供应。

过去十多年中，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引发了页岩油为代表的石油产业大变革。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世界上第

¹⁵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and U.S. PIRG Education Fund Offshore Shell Games 2016—The Use of Offshore Tax Havens by Fortune 500 Companies, pp.12-13, 2016.

¹⁶ 同注释 1, pp.1-2。

¹⁷ OECD, 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13.

一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的美国，就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 2014 年 6 月），从而大大降低了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

2005 年，美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为 60.3%，2015 年降低到了 24.1%。短短的十年时间，进口依存度降低了 36.2 个百分点。其中，对 OPEC 成员国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下降。2015 年，来自 OPEC 成员国的石油只占美国进口石油的 30.6%（2005 年时为 40.7%）。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美国不仅可以减少对于 OPEC 成员国的石油进口依赖，也很快可以实现石油的自给。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产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页岩油产业的繁荣直接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其二，石油生产的增加也大大减少了能源的进口，大大减少了美国货物贸易的逆差。过去，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大大减轻。比如，2008 年高峰时期，美国石油贸易赤字高达 3914 亿美元，占了美国货物贸易赤字的 47%，而到 2015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879 亿美元和 11.5%。

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废除能源产业中的种种限制，促进石油和煤炭等产业的生产，那么，美国就可以实现产业以及就业的同步增长，并减少对于进口石油和能源的依赖，甚至实现贸易盈余。但是，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增长，却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中的承诺实现。

第七，通过税收优惠（甚或关税惩罚）以及政府采购等形式，留住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商务活动。

2016 年 11 月 30 日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宣布凯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不再将 1000 多个工作机会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转移到墨西哥。促使凯利公司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特朗普的劝说——印第安纳州给予该公司 700 万美元的税收优惠；其二是特朗普的威胁——威胁减少、甚至终止其母公司的联邦政府合同¹⁸，同时，威胁对于将生产或者其他经营活动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同样的方式，特朗普试图运用到更多的公司身上，比如，打算将产业轴承生产从印第安纳转移到墨西哥的雷克塞德公司（Rexnord Corporation）等。

¹⁸ 凯利公司的母公司——联合技术公司，是一个主要从事联邦政府军事采购合同的军工企业。

从短期和单个案例来看，这样做也许能够带来一些改变，实现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的目标。但是，长期效果如何却值得怀疑。因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甚或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最大利润本是企业天经地义的事情。特朗普政府却要通过各种办法改变企业经营的约束条件，促使美国企业留在国内经营。这样做只具有短期效果。长期来看，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会仅仅基于某个国家的某个政府的某项不确定的政策优惠之上的。并且，正如美国著名贸易专家罗伯特·劳伦斯所评论的那样，“这样做，也开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即：标志着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向以交易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变”。¹⁹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特朗普的七大贸易政策。对这些政策，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单个地看，而应该联系起来、系统地分析。单个地看，似乎七大政策中的不少政策都很难实现政策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参见表1），但是，综合地看，这些政策却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特朗普之所以要退出WTO、退出TPP，并叫嚣着要对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就是因为他反对美国企业和产业的海外转移，反对区域、全球生产网络下，美国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地位；他并不反对贸易自由化，而是反对引发美国产业转移的区域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自然地，他同时也要大力推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市场开放，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出口市场机会。这样，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稳住、甚至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将美国企业和产业留在国内，并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打开外国的出口市场，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²⁰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特朗普上台以后，预测美国贸易政策的如下几个变化。1) 促进出口，适当减少进口，尤其是石油的进口。这样，美国的贸易平衡会得到很大的改善。2) 虽然不会针对某个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全面的、长时间的、大幅度提升关税的措施，但是，却会在某个时期、针对某个国家的某种产品采取更多的、幅度更大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甚至暂时性的关税保护。3) 与此相伴随，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加剧：一方面，美国会更加关注其他贸易伙伴的政策变化及其对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更加

¹⁹ Robert Z. Lawrence, “Trump’s Carrier Deal Is Not a Victory for US Manufacturing”, Dec.5,2016, PIIE, OP-EDS.

²⁰ 简言之，这种政策选择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区域化、全球化的推进太快了、过度了，需要减缓一下、纠正一下。

积极地推动自身的出口贸易以及对外投资的扩大。4) 通过双边谈判, 和主要贸易伙伴缔结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 而基于政治和战略考验与一些小国缔结双边协议的意愿会大大降低。5) 在多边、诸边领域中, 大力倡导和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推动和倡导新的议题, 引领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制定的动力有可能会减弱。6) 进行国内改革, 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本国的企业和产业。

特朗普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头羊, 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对自身以及全球经济、主要贸易伙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 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受阻: 巨型区域贸易协定以及 WTO 范围内的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会暂时放缓, 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的领导角色会暂时出现真空。2) 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多, 对于国内企业的投资优惠, 有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3) 大幅度减少税收,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4) 世界的能源市场、尤其是石油市场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两方面: 其一, 需求方面, 美国进口需求的下降, 会大大减缓世界市场的需求增长; 其二, 供给方面, 美国供应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在此供需结构下, 世界石油价格将会长期低位运行。

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和制造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巨大的挑战, 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不平衡也可能减少。2) 被迫与美国进行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 尤其是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会以“对等性、互惠性”为借口, 迫使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3) 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力度会加强、频度会增加。4) 作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石油的进口环境会相对改善——较低的价格, 较稳定的供应。简言之, 中国将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关注的头号目标。来自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是中国未来几年将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对中国的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似乎是有利方面, 即: 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空缺出的位置为中国提供了补进的机会, 全球治理中出现了一个难得的“中国时刻”: 1) 奥巴马政府通过 TPP 排斥中国, 构建亚太经贸新规则的企图破灭了; 2) 美国退出之后, 不少 TPP 的成员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推进现有的 RCEP 进程, 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甚或全球化进程出现停滞之时, 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甚至还有一些 TPP 成员, 和

其他一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补充美国的空档，发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领导者角色。其二，不利、至少是不确定的方面，即：美国从多边贸易体制和机制中抽身而去，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否仍然能够维持（上边的有利影响，就以传统多边体制的存在为前提）？是否标志着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甚或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呢？以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巨大体量，它所作出的选择一定不会没有追随者的。这种调整会对中国以及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影响和冲击呢？首先，要积极推进自身的开放进程。在关键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中，我们要进行有序的改革和开放试点，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其次，要更加积极、坚决地推动 RCEP 谈判进程，如期完成谈判，尽早生效。不管这个协议带来的收益如何，早日完成和实施，就是中国领导力的最好体现，也会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巨大的红利（中国领导力和中国方案的体现）。当然，中国也要仔细观察和适应美国所推动的双边贸易化趋势，一方面，管理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

对特朗普贸易及相关政策的评价

总体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长期贸易政策的一个大转折。但是，这种转变是否代表了一个方向和趋势，抑或只是昙花一现，尚待观察。现在看来，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很多政策，只具有短期、暂时的效应，似乎只是权宜之计。

1. 特朗普的贸易及相关政策基调，以就业作为目标和主线，显然，是选错了方向，甚至是误入歧途

在特朗普竞选以及当选总统之际，正是美国就业市场状况大大改善之际——失业率已经从 2009 年金融危机时期的 10% 左右下降到了 5% 甚或以下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如果在此基础上，仍然要降低失业率，似乎吃力不讨好。

与较低的失业率相伴随，美国就业市场上，也存在着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劳动人口中，很多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再寻找工作；他们也没有领取任何政府救助金，从而没有在失业统计中反映出来。这些人被排挤在美国经济之外，从而对于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庭以及社区带来伤害。

因此，特朗普政府要做的，首先是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这些人全部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对这些人提供充足的再培训机会，鼓励他们重新上岗。其次，要引导美国劳动者向着适应开放条件下美国产业和服务业要求的方向发展——高技能、熟悉计算机的、服务型的工作要求。²¹

2. 退出 WTO、TPP，重新谈判 NAFTA 以及建立双边协议，威胁对墨西哥和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显然，是要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转变

基于市场力量之上的国际合作，更多地，只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因为，在相互交换市场机会的讨价还价中，只有能够提供对等市场机会的国家才会进行互惠性的、对等市场开放，小国则被排除在外。

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的这种合作，也会带来相互的报复，从而使得从一个国家、产业和企业角度来看，合理的决定，在大国博弈下，则会变成一种不合理的选择。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某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比如，美国大幅度提高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那么，中国一定会进行报复——提高来自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这样，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也会减少，从而丧失就业机会。

同样地，如果美国限制本国的跨国公司从事业务外包活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从而限制了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活动。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再比如，在公司所得税上，美国降低税率，也会引发其他国家这么做。法国和德国在特朗普宣布降税的决定之后，立即进行反驳就是一个信号。这样的“触底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bottom），没有赢家。

战后，国际社会努力的结果，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是建立了以规则、而不是以市场力量、更不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从而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国际秩序。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中，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国家可以对于另一个国家违反规则的行为，采取合法的、不会引发报复的贸易限制行为，比如，提高针对这个国家某些产品的关税水平，或者附加进口配额等。即便是长期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家的美国，也经常遭受其他弱小成员的起诉。

²¹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是否接受、何时接受奥巴马总统所竭力倡导和推动的社会保障改革法案，作为检验特朗普贸易政策是否从现有基调进行调整的试金石之一。

因此，WTO 以及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比如，NAFTA 及拟议中的巨型贸易协定 TPP、RCEP 和 TTIP 等，都是在创造这样一种机制，即：在规则基础上，成员国之间正常（非歧视、公平地）进行贸易活动；一旦某个成员违反规则，则其他受到损害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单方面地采取贸易反制措施进行纠正，而不会导致这个成员的报复——不论这个成员的市场影响有多大。特朗普是要走回头路吗？

3. 进一步讲，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西方新政府，以及支持英国公投、特朗普总统的欧美选民们，其表面上是在反对贸易开放，比如 TPP、TTIP、甚或 WTO，反对全球化，本质上，却是在抗争贸易开放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组合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的收益分享，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内部，非常的不公平、不包容和不及时。在贸易和投资扩大的同时，很多遭受开放贸易冲击的产业、工人以及社区、甚至地区却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从而使得这些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一个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却在发达国家内部造就了受到伤害、遭受不公平、被忽视的众多产业群体和地区。

现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必须要做：第一，补偿和救济丧失工作机会的劳动者；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高技能、计算机化的服务导向经济的需求。在发达国家中的劳动者，必须具有更高的素质，适应更高水平的要求。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中的工作，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高端的、高收入、高素质工作；其二，是低端的、低收入的、“非贸易”、“本地性”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必须具有强有力的协调功能——将这种极端化的工作类型以及劳动者协调起来。否则，将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在特朗普的所有政策组合中，没有社会保障政策、也没有收入调整和再分配政策！

4.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与传统的主权国家、传统的本土公司理念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的存在，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有效的配置成为可能。全球化，最大程度的，或者向着最大化程度，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为世界和全人类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越来越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面临的

最严峻、最现实挑战：1) 民族国家，既要推动全球化，又要照顾自己的国民，尤其是不可流动和遭受全球化冲击的国民；2) 本土公司，既要跨国经营，又要效忠母国；但是，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种冲突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税收领域中已经非常尖锐了。其中，在国际贸易领域中，WTO 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基于附加值之上的国际贸易统计系统建设；在国际税收领域，OECD 也于 2013 年出台了 BEPS 报告，并开始推进国际税收方面的合作。现在这种冲突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域中凸显出来——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就是这种冲突的活生生体现！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竭力探索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基于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竭力避免重新走上孤立、封闭，或者大国对立的老路上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政府重新回归国内、重新推进双边贸易谈判、阻止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却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二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盛行孤立主义，也非常重视和强力推进基于“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双边谈判和协议。难道历史要倒退吗？

结 论

第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是延缓、甚至阻止进一步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力阻美国产业和企业向海外转移，鼓励和支持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国内发展。因此，它会对于贸易的赤字更加敏感，甚至会陷入到重商主义者的政策漩涡之中；同样，也会更加倾向于自身利益，而不是世界领导者角色。第二，美国贸易会有这样几方面的重大变化：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留住本国企业；减少石油进口；更多地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增强；缔结更多的双边协定，对于区域和多边贸易谈判的热情降低；倡导新规则制定的领导力减弱。第三，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冲突会增加，但也存在着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进行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第四，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走向以双边贸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 60 多年的多边贸易体制也面临着存亡挑战。第五，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回归国内、注重双边的贸易政策大转变，是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还是昙花一现，值得观察。

本文作者宋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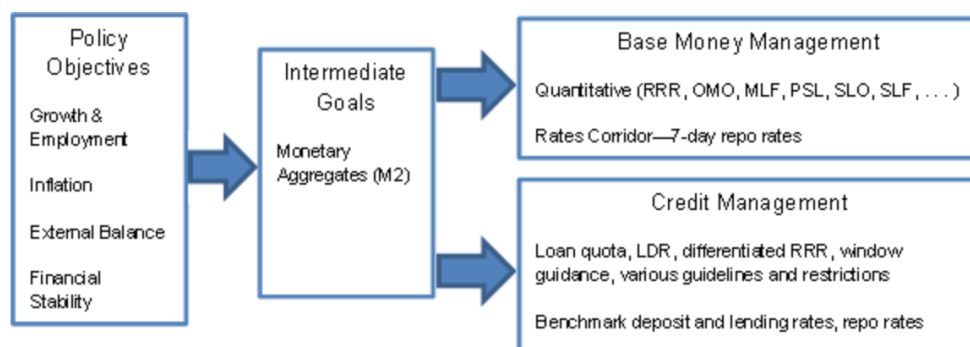
Jame A. Dorn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货币主义理论往往被误认为不重要。在不可能三角的限制下，大多数央行都放弃了货币目标，转而将政策目标着眼于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是，中国早在 1998 年就采用了“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政策。本文用两个公式描述了中国央行使用工具达成政策目标的方式，阐释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防止了严重通胀或衰退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央行缺乏独立性的事实。编译如下：

货币主义常常被误解、被忽视、遗忘，甚至嘲笑。然而，在一个法定货币的世界里，它基于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明显的且重要的。

大多数央行放弃了货币目标，转而设定利率来实现长期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中国是个例外。自 1998 以来，为保持名义收入稳定增长和防止过度通胀，中国人民银行（PBC）使用了以货币增长目标导向的货币政策（见图 1）。

Figure 1: PBC Monetary Framework^[1]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目标与在中国的中央计划和高度国有的金融体系是一致的。中国人民银行受国务院监督；金融体系则以国有银行为主；资本市场是高度管制的；而利率和汇率则十分扭曲。正如中国政府指出的，中国独特的混合市场、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称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为“有中国特色的货币主义。”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

瑞银经济学家陶望和她的团队对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目标描述如下：

不像一些发达的中央银行直接关注一定的政策利率或通货膨胀率，中国人民银行是以有针对性的广义货币总量（如 M2）来实现自 1998 来宏观经济目标的。M2 增长目标通常是由 GDP 增长率和 CPI 通胀目标加几个百分点的“金融深化”组成的。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尝试提高以价格为基础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但目前央行仍主要依靠管理基础货币供应量和直接控制信贷增长，以达到预期的广义货币的增长（Wang et al, 2017）。

中国人民银行不是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而是由国务院管辖并向其报告。政策制定者根据 CPI 通胀和实际 GDP 增长计划来设定货币总量增长的目标，这二者的总和等于名义收入的增长。货币数量理论很简单，它的背后是货币主义的逻辑，即在加入一些调整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变化后，指定每年达到 X% 的名义收入增长，货币数量应以类似的速度增长：

$$(1) \quad \Delta M/M = \Delta P/P + \Delta y/y - \Delta V/V.$$

中国人民银行不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可以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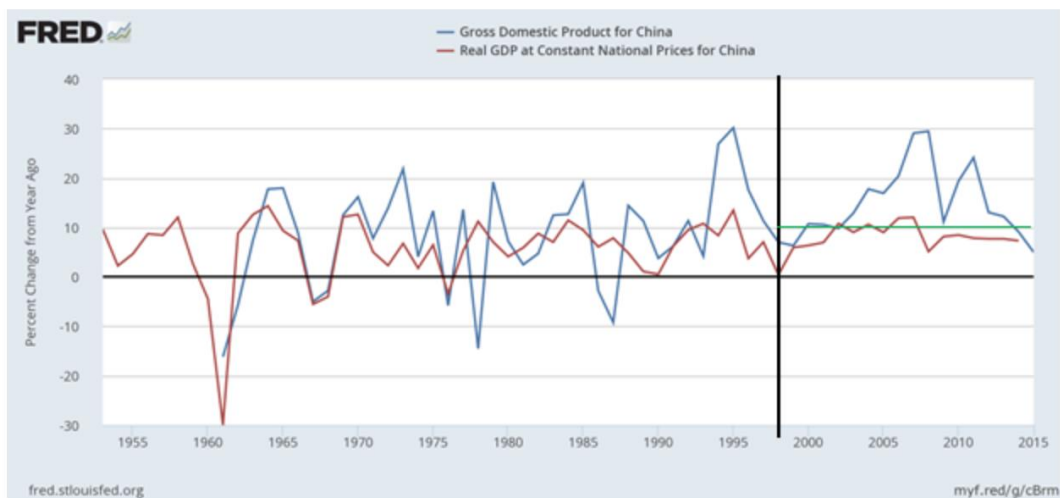
$$(2) \quad M = mB,$$

M 是货币乘数，B 是基础货币（即公众持有的货币加银行储备）。

为实现货币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依靠控制基础货币和使用各种工具来调节信贷流动（见图 1）。国有银行体系在中国意味着新创造的基础货币可以导致银行货币储备的大幅提高（图 2）。当国有商业银行拥有超额准备金时，它们会将其贷出去，以满足向他们的目标信贷计划，这就创造了活期存款的成倍扩张。M 的增加将流入经济，首先影响产出和就业，其次是价格水平。

Figure 2. The M1 Money Multiplier in China Is Working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货币规则自 1998 使名义 GDP 增长率从未低于 2000 - 13、10%，即使是在 2008 全球金融危机（图 3）。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实际 GDP 增长放缓，名义 GDP 增长也放缓了。

Figure 3. Real and Nominal GDP Growth, China

中国的金融抑制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使用货币目标、保持名义收入的稳定增长和防止过度通胀方面相当成功。但任何评估都应考虑到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是在中国的狭隘低效的金融体系中实现的。

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金融抑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以低利率或负实际利率的形式进行资本管制和信贷配给。国有银行青睐国有企业贷款（国有企业），而不是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这导致了资本配置不当。存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是有意让国有银行有利可图，从而产生税收收入。通胀能将实际存款

利率转为负值，对储户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国有银行的低贷款利率导致了可对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和定额配给而非信贷的使用。

中国已允许设定利率时保持更强的灵活性，但仍使用基准利率保持一个国有银行的正利率。民营企业发现它们国有企业难以获得低息贷款，于是不得不转向影子银行系统，在那里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利率。投资替代品的缺乏以及资本外流的严格控制，导致超过 50 的 % 国民收入被储蓄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抑制，但金融业仍处于强大的国家控制之下。

诚然，中国已经开始降低人民币汇率，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通过保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阻止资本外流，并因此使用了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人民币汇率，所以在外汇市场上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为抵消基础货币的减少和防止通货紧缩，中国人民银行必须通过从国有银行增加储备银行系统购买证券（中央银行票据等）来增强外汇干预。但这是一项棘手的业务，因为资本流出越大，对人民币的下行压力越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行压力的概率越高。这一现实使得它越来越难以捍卫盯住汇率的政策，以及有序管理货币供应规模。

在中国特色货币主义中，央行盯住了 M2 与计划名义 GDP 增长，牺牲了连贯性，来实现政策目标（见“政策目标”图 1），却被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阻碍了。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导，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接待来完成中央银行在国务院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的指令，这以为这经常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调整。

教训

在一个法定货币化的世界里，中央银行需要以货币规则的形式进行锚定。货币数量理论所预测的货币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之间有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自 1998 以来，因调整货币供应量，中国已经防止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在货币政策拥有多重目标的情况下，金融抑制和削弱了货币主义。

在应对信贷配置风险的时候，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可以从中国调整货币供给的经验中学习。中国需要支付超额准备金利息，但超额准备金率远低于贷款利率。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货币乘数没有崩溃：基础货币的增加也提高了货币供给和名义收入。

如果美联储采取了一个简单的货币规则，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降低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结束信贷配置，减少繁重的宏观审慎监管，那么货币乘数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会提高，另一场金融危机也可以避免。

本文原题为“Monetar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本文作者 Jame A. Dorn 为 Cato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和朝鲜：是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还是继续保持冲突状态？

Scott A. Snyder/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上任，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有关朝核发展的新年致辞。人们对美国接下来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问题，美国与朝鲜关系如何发展都在积极关注中。2017年1月5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特朗普和朝鲜：是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还是继续保持冲突状态？》，作者主要介绍了朝鲜2016年核试验的一些情况，金正恩在充满争议的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希望，以及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朝鲜无核化等内容。编译如下：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周日的新年致辞中又投下了一颗重量级的“炮弹”：他提到，回顾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ICMB）已经到了准备试射的最后阶段。

至少，这是金正恩的意图。多年以来，这些威胁都被视为虚张声势。因为人们非常清楚地认为，朝鲜没有能力实现它的野心。但是，2016年形势好像已经发生了变化。

去年，朝鲜进行了24次各种类型的导弹试验，包括测试射程3000公里范围的舞水端中程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朝鲜媒体声称，该国现在已经有可以在各种导弹上发射的“标准化”核弹头，并在推进洲际弹道导弹（ICBM）所需的掌控气压再进入方面取得进展。一些分析人士评估说，朝鲜已经有能力用洲际弹道导弹（ICBM）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并且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朝鲜在2020年之前会拥有虽小，但是可怕的核打击能力。这种旨在扩大朝鲜能力的举动不断爆发，使得人们必须要认真对待金正恩的核意图。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1月2日回应了两个推特：

1、朝鲜刚刚发表声明说，能够到达美国部分地区的核武器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阶段，然而这种事情我是不会让它发生的！

2、中国在与美国单边贸易中获取了大量金钱与财富，但这对朝鲜也毫无帮助，耶！

但是，美国既不能只忙于夸大“核威胁”，也不能期待中国对朝鲜实现无核化来掩盖事实。事实就是，只要朝鲜继续朝着核方向发展，那么美国就不占时间优势。

朝鲜把国家的生存和对外战略押在了美国最终会默许朝核武器的存在，而不是对内进行强有力的政权改革上，这样会让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以及

美国卷入巨大的财政成本。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再次声明：只要美国减少每年的美韩军事演习次数，承认朝鲜核武器的存在，搁置其“敌对政策”，那么朝鲜才会慢慢接受无核化。

从本质上讲，金正恩似乎是在吸取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的教训，即有核武器才不会被打败。

金正恩也希望，中美地缘政治的不信任现状可以阻止中美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朝鲜的政权更迭。中国对朝鲜实施的不均衡的经济制裁和在特朗普推特中发出的更具有对抗性的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这都给朝核问题与金正恩政权发展带来了希望。

人们普遍期望，金正日能在早期测试特朗普政府，正如朝鲜于 2009 年用导弹和核试验问候奥巴马政府一样。美国对朝鲜的有效反应将促进特朗普政府探寻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方式，这会使金正恩感到惊讶。至少，当选总统特朗普会将孤立朝鲜作为存在争议的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另外，为了停止朝鲜的核发展，必须共同合作加强对其的制裁。

只有这样，金正恩才能认识到他的反抗是失败的，他必须结束朝鲜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威胁。

本文原题为“Trump and North Korea: On the Mark Or On Collision Course?”。本文作者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研究韩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和美韩政策项目的执行者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 2017 年 1 月 5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之行：马蒂斯的使命

Scott Warren Harold/文 章珏/编译

导读：本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文章认为，马蒂斯此行主要有三个使命：一是加强与日韩两国领导和防长的个人交流，二是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三是强调东北亚各项问题上美日韩开展双边和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而其向盟友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编译如下：

本周，新任美防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以安抚盟国的紧张情绪，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在竞选期间就宣称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卫经费，并在就任首周就宣布退出 TPP，特朗普的上台确实使美国的一众亲密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而马蒂斯此行也将传达一系列特朗普此前一直在传递的信息，即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

马蒂斯此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开拓并加深与日本首相安倍和防长稻田朋美的个人交流。他可以继承奥巴马任内开辟的各项友好合作，并在军事领域开辟新的合作方式。

安倍政府也盼望马蒂斯能重申双方同盟关系，特别是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但马蒂斯可能利用此行来敦促安倍政府不要停止冲绳新基地的建设。

在会见韩国代总统黄教安和防长韩民求时，马蒂斯传递的将是相似的信息，那就是美坚定支持美韩同盟关系。对于韩国来说，目前国内的政治动荡尚未结束，国外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此时美国重申两者盟友关系将是有利的。此外，马蒂斯还可能鼓舞韩国尽快在半岛部署萨德。

与两国的首脑和防长会面将利于马蒂斯解释特朗普政府正在追求的亚太安全战略目标。面对中国和朝鲜，特朗普政府似乎将诉诸一种更强硬的姿态，但却尚未明确各盟友该扮演何等角色。马蒂斯也可能声明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情况，同时提示美将在该地区扩展导弹防御力量，而这些领域都是日韩盟国可以参与合作，共同研发的。

马蒂斯此行的第二个目标是寻找合适的方式，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美国不会离开亚太，但是它已无法独自面对崛起的中国和核挑衅的朝鲜所带来的挑战。近几年，日本在加强自身防卫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自卫军和日美军队互助上可以做的更多。韩国在发展对朝互相摧毁力量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可以在相关领域做的更多，包括军事指挥、控制、计算机、导弹防御等。韩国还可以增强自身反潜能力和炮火实力等。

而发展上述实力将要求日韩两国投入更多的资金。马蒂斯可能声明，如果两国在自身安全上能投入更多力量，那美国将不会要求两国在驻地美军方面承担更高的费用。

马蒂斯此行的第三个目标将是强调在东北亚各项事务上开展双边或三边合作的重要性。马蒂斯可以鼓励日韩在下述领域继续迈出积极合作的步伐，包括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交流和三边弹道导弹防御演习等。

在众多合作领域中，最应该被尽快讨论的就是关于半岛危机发生后，平民安全疏散操作将如何进行，三边该扮演怎样角色，以及建立何种沟通渠道。虽然美韩两国和日本自己已经在该问题上做了相关准备，但是日韩两国尚未就该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以最终确定相关假定和提前采取行动举措。鉴于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只有在和谐的双边会谈中提出该问题才合理，然而目前朝鲜持续挑衅，开展相关讨论的紧迫性也在不断提升。

新政府之初将是重置过去假定，探寻处理地区外交和安全问题挑战的长久方法的阶段。马蒂斯上台后能如此早就访问日韩两国是极好的。如果他能重申新政府对于日韩两盟友的全力支持，同时明确美国政府的期望，那么在安抚对新政府持有不确定态度的亚太盟友的道路上就能走很远。

本文原题为“Mattis' Mission in Asia”。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科学家 Scott W. Harold。本文刊于 2017 年 2 月 6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

John Nilsson-Wright/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随着1月20日的到来，特朗普将真正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执政者。日本安倍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争取特朗普执政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谈。2017年1月17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网站发表文章《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作者主要从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东海、南海领域合作的利益，美国对韩日两国发展核武器以及日本对核武器发展的观点，TPP被废止后日本的新选择以及未来日本在美国和亚洲地区合作中的角色等三方面进行了叙述。编译如下：

11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日本与美国新政府建立关系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与特朗普政府关键人物（最明显的是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初步接触可以促使东京人们相信，两国不可能签署双边共同分担国防防御负担的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以从初始的迹象中得到一些保证：前布什政府在亚洲地区安置的一些关键性国家，在今后将有可能担当更重要的位置；美国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安全政策，这可能成为东京和华盛顿加强协调合作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特朗普是否需要一份日本对其带有实质性的承诺，即加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安全。同时，安倍晋三将寻求美国早期支持其在东海的战略利益，以及对钓鱼岛防御的声张。对此作为回报，日本可以向美国提供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终端高空地区防御（THAAD）导弹系统的承诺，这与美国 and 韩国最近达成的协议类似，从而有利于帮助防范来自朝鲜的核威慑。

首先，特朗普不可能兑现他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可以推动首尔和东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提议。其次，即使特朗普同意他们发展各自的核武器，日本对核也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由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因此任何日本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去考虑同意发展核武器，甚至在面对事实上的核朝鲜或者韩国的时候，公众舆论更倾向于接受韩国有核武器。

在短期内，日本经济前景将受到特朗普政府承诺放松管制、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预期的鼓舞，这可以让日本在美元相对利率上升日元贬值的情况下，使得日本公司获得新的出口机会。

这种新的乐观情绪，反映在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约百分之一的预测中（根据经合组织），它部分抵消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特别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国和墨西哥的日本海外生产设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份额。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基本上被废除，安倍政府将关注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替代性区域贸易协定。安倍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涉及到他在 TPP 上投资的政治资本量，而且也寄希望于 TPP 可以抵消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

今年，安倍首次海外访问国家有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但是，安倍首相也奋力争取能在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职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议。鉴于美国选民的孤立主义情绪很强烈，以及关注欧洲（尤其是脱欧后的英国）应对国内的一系列挑战。因此安倍政府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新环境是提高日本作为国际秩序和法治倡导者作用的好机会，同时日本也会成为美国和亚洲其他主要合作伙伴之间联系的关键媒介。

本文原题为“Japan’s foreign policy will now be dominated by the need to maintain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the US”。本文作者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John Nilsson-Wright。本文刊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